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逝去的年代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酋长话语

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
——尼采

一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心绪特别繁杂，老走神，磨蹭了许久下不了笔。但是，一想起谢泳，一想起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一想起他的西南联大，一想起储安平与《观察》，大脑中就浮现出一幕幕悲壮的画面，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

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风格，在现代随笔新三家（摩罗语：林贤治、谢泳、余杰）中确实自成一派，怪不得那么多出版社的漂亮女编辑在寻找谢泳，巨大的感性魅力和理性力量催人深思。谢泳不是最卓越的，但却是惟一的。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然后信手写成学术随笔，展现给我们——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自由知识分子都被他画了素描，他们的伟大与卑微跃然纸上。他说 :“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一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呵…… ” 一刀见血，不愧为 “ 太原剑客 ”。

当今时代，“ 知识分子 ” 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1467 页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有文化的人就成了知识分子。而至于他们的知识有多有少，是真是假，有用无用，正动反动，有害有益，人们往往是忽视的。

对此定义，我早就持怀疑态度：一般文化人是知识分子，大教授也是知识分子；喜鹊是知识分子，乌鸦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岂不太模糊了吗？后来，我在外国人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外国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这使我恍然大悟，如果按外国人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人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不是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杀光了）。对此，我向隐者徐无鬼先生做了专门的请教，并达成了共识。我们将现在“ 知识分子 ” 的内容升级为两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第一

层就是我们词典里的解释，即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授，不管是不是社会的良心，统称为知识分子。

第二层是苛刻的，就是智识分子，智即智慧，识即识见、思想。智识分子应该是外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的特点。若按此观点，恐怕谢泳书中的知识分子也要分化为两个阵营。

我同谢泳的第一次相晤，是在 10 月份的一个夜晚。其时，他从太原刚到北京，我则从呼和浩特出发专门赴约，同宴的有余杰、摩罗、李可、冯晓哲诸君，虽然外面秋风萧瑟，而我们的内心却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谢泳剃着普通的小平头，谈笑风生，一如他的文章般稳健和蔼，仿佛一杯陈年的酒，愈饮愈醇，足可抵挡俗世的浮躁。

二

《哲人的蠢话——一个隐者的残稿》，作者系徐无鬼先生，真名不具，是一匹老黑马，于 1990 年后辞职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通过《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耻辱者手记》和《47 楼 207》为红娘，我们两见如故。辩论，唱歌，弹钢琴，在后花园打乒乓球，吃自己庄园种的 24 种纯天然蔬菜，在“黑马圈”喝自己酿的米酒，拜访草原活佛，听张浩崔小莉读余杰的文章……是我每一次回“草原部落”和“草原部落”每一匹黑马到内蒙的必修课。人生苦多，此乐何极！

徐无鬼是一狂徒，不仅狂饮，而且最擅长酒后狂骂，骂独裁者，骂“文革”，骂卑鄙小人，骂贪污犯……无所不骂、淋漓尽致份他自己说，这一优秀品格是从于北辰先生身上偷偷学到的。于老是内蒙古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胡耀邦的同事，四川大学的高材生，20 多岁就当县级干部，现任某中央领导在延安上幼儿园小班时，他教大班。他从 1949 年就写文章《革命是为了穷吗？》，60 年代就开始骂江青……一直骂到现在 85 岁了，仍然精神矍铄。一次，当我向于老请教长寿秘诀时，他朗声大笑：“有什么秘诀，无非是想骂谁就骂谁！”在这一导师的言传声教下，徐无鬼从内蒙骂到北京，又：从北京骂回内蒙，骂技日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破口时就破口，最后见被骂者不可救药，帐然隐居田园。在前不久的一次沙龙中，一名记者为“文革”唱赞歌，争执不下，徐无鬼大怒，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让人好不尴尬。

关于徐无鬼的逸事掌故多如牛毛，只讲两则。其一，徐先生上哲学课总闭着眼睛，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完全是一副物就两忘的境界。一日，讲到动情处，先生老泪纵横，一只手从左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擦，学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顿时引起哄笑。先生知道掏错了，气定神闲地从右衣兜里掏出手绢，又往脸上抹，学生一看，是另一只袜子。足见徐先生的记忆力不好。一般若无人陪同或接送，徐先生独自是回不了家的，要么会走错家门，他不止一次地走到曾经陪同一个老朋友只去过一次的情人的家里，结果却叫不开门。其二，本地省政府的某一高官去拜访他，徐先生派妻把客人的奥迪坐骑挡在柴扉之外，告诉对方，他正在与人谈话。客人惊问：“与什么更加重要的人物谈话而不见我们？”妻告曰：“苏格拉底！”徐先生的好朋友除了苏格拉底外，还有索尔仁尼琴，他亲切地称之为“索兄”。一入他的书屋，索兄目光如炬，让客人不敢仰视。

徐先生虽然表面潇洒若陶渊明，但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其一，他认为，

嘴有三项功能，吃饭接吻发议论，而今却只有两项功能，非常痛苦；其二，他认为，人有三大痛苦，无侣无朋无类，而今只有伴侣、朋友，却很少同道，所以也让人痛苦。其三，佛经中将人的痛苦分为四类：生、老、病、死，他认为这四类不全，应该是“生、老、病、死、思”五苦，思想的痛苦是最深层的痛苦。所以，他才拉来雅斯贝尔斯、伏尔泰、索兄、尼采等朋友对话，聊以慰藉他那颗孤独的心。他经常说的格言有三句，一为“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二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便是国王”（西方谚语）；三为“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蝶上一样”（伏尔泰）。

正因如此，他常常夜半从梦中醒来，长叹不息，他说：

小时候，母亲用最亲切最温柔的催眠曲对我唱：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我便甜美地进入那仙幻之境。

现在，我长大了，长老了，睡不着了，谁能令我回到儿时的梦境？我睁着漆黑的眼，望着漆黑的夜，做着漆黑的梦，发出漆黑的呼喊……

三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一切欣喜悲伤都浓缩在这一套薄薄的“黑马文丛”中。这是一套思考中国母亲的启蒙读物，这是一套青年智识分子展望未来的登台宣言，也是一个孤独的牧马人和一群黑马艰苦拼搏的故事。

不得不申明的一点是，前些日子在徐无鬼阴山别墅“黑马圈”的落成典礼仪式上，我已宣布，黑马只选 10 匹，该封圈了。但有许多朋友坚决反对，几经斟酌，虽然再不推出“黑马”，但推出三部“黑马文章”集，作为收尾之作，以飨读者。其一，《审视中学语文课本》（暂名），对中学语文课本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批判；其二，《大型学术刊物〈方法〉杂志精华本》（暂名）；其三，《第四种权力——中国新闻自由的焦点访谈》。

此外，还推出“草原部落智识分子论坛”，即《顾准选集》、《孙悦生遗稿》和《钱理群文集》，作为 1999 年的见面礼。希望读者能够接纳。

作为一名智识分子，作为一名出版家，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是用民间的思维去关注苦难深重的祖国母亲，并用思想的光辉去唤醒那些麻木的灵魂。呵，我的 1999，究竟是喜还是忧？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贺雄飞

1998 年岁末于草原部落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

1991 年 3 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 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

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 1 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 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

学史》及“ 贞元六书 ”，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 新中国的哲学 ”，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 :“ 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这是 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 ” 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 :“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 文革 ” 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 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 一二 · 一 ” 运动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又亲自给“ 一二 · 一 ” 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在 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

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 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 80 年代只有他的学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他在 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白一个 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

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史记〉的书生私见》是 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 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 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 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 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书尾附一份 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不到半页，其中只有 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 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

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要不“ 天真 ”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 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 ”。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 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 那时这些读书人也真是“ 天真 ”。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 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 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 弟既蓄志教书，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 整个 40 年代钱先生先服务于西南联大，之后又回北大，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才离开。这期间钱先生曾在 1947 年到 1948 年间在哈佛做客座教授，期满后谢绝了留在美国的邀请回到祖国来，初期还很有心劲，1950 年应储安平邀请，给刚刚复刊的《观察》周刊写了一篇长文《统一战线 · 人民政权 · 共同纲领》，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以后便不多写了。1950 年，钱先生 50 岁，多好的年龄啊。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书外，还编刊物，编《今日评论》。在当时的《当代评论》、《民主周刊》、《观察》周刊上大量发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各种专论。他对国家的未来有一套完整的设想。我查阅《当代评论》时见到他写过这样一组连载文章，无法抄引原文，但看一下题目也能见出钱先生的风采：《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论自由》、《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青年的思想》。对这些文章阐释的思想可以见仁见智，但看得出这是一个政治学家在独立地思考，严肃地追求。政治学是科学，钱先生早年选择了它，后半生却没能再像他青壮年时那样敢想敢说，对一个终身治政治学的学者来说，他的内心能不寂寞吗？政治学是科学，但却是危险的科学。钱先生是寂寞的，当年清华出身后来留美的一批政治学者哪个不寂寞呢？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等，都在寂寞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和他们比起来，钱先生还算是不寂寞的。

安福三才子

研究中国现代史，无论如何绕不开清华大学。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相当多的人物是从这里出来。早年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一个孩子在这里经过 8 年的培训，然后放洋，再回来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样式，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1995 年 4 月 30 日，我第一次来到清华，观察每年一度的校庆活动，我特别留意那些早年毕业于清华的人，可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很少了。再看年轻一代，大部分是 50 年代的清华学子，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多了新的色彩，但不管怎样，在热烈的气氛中，看到清华人的风采，我就想，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大学教育是同步的，没有清华，没有北大，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会是怎样的。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清华在 50 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不仅是清华的损失，也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早年清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在 30 年代已经很成功，以后实际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想不到她的半壁江山很快会失掉。

关注清华是由于做西南联大研究，更是由于这里早年蓬勃的朝气。但在对清华的关注中，我不大留意这里有多少得意的官员，而关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也许这些人身上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我想到了安福三才子的命运。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三个少年，谁也想不到他们后来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结局。他们三人中，罗隆基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二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 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安福二才子，由清华放洋后，再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但三位才子，又对做官无太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罗隆基和王造时靠自己手中的笔，不知写下多少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又不知把多少精力直接投入到现实政治中去。罗隆基曾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参预了 40 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和罗隆基有一样的政治热情，还有彭文应也是如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都是“书生论政”的典型。近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与清华割断传统有关系。遥想当年，清华是先有大学者，然后有大官的，基本走的是文人参政的道路。安福三才子，对政治都有热情，但非空言政治，三人都可以说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而他们靠学术的力量，再去投身现实政治，自然比别人要高出一筹。早年清华的传统虽然不完全鄙视学者从政，但还是将做学问看得比做官更让人尊敬。安福三才子中，要说做官，大概都谈不上，罗隆基和王造时只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彭文应则一直以教书为生。罗隆基在政治上确有一套想法，但他和他的两位小弟兄一样，还是以实现民主宪政为自己的终身理想的。而这种理想，是早年清华给予他们的，清华早年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许多思想家，而清华后来的衰落不是在技术上，是在思想上。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也关心，清华是真正有“五四”精神的独立家园。

安福三才子，在 40 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

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然而命运又几乎同时出现逆转，都没有逃过反右和“文革”这两大劫难。今日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才子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推动一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安福三才子未尽的理想，何日才能实现呢？唉，安福三才子，愿你们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天凉好个冬

最初读到季羡林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时，心里就有一种触动，当时就想，年轻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中年人（60 岁左右）也不行。前几日看到《收获》杂志上有许明先生谈季羡老的文章，也说这文章好，我很欣慰，觉得自己没走眼。那几日我正在整理有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资料，因了季羡老的那篇文章，我从这些资料中检出一些有关季羡老的，写成一则短文：《季羡林与学生运动》，写成后投寄给一家报纸，终于没登出来。季羡老是 1911 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40 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的时候，季羡老是封面底下列名的 78 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的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羡老后来也没再写过。《观察》1950 年复刊时，季羡老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我写《季羡林与学生运动》，是由他在 40 年代学生运动中的立场而发的感慨。季羡老与储安平是朋友。30 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羡老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将季羡老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老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羡老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 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 1961 年 9 月 3 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

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 1958 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 1961 年秋在广州谒陈寅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 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张东荪这个人

90 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写了 14 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

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 1949 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30 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方》杂志）。金岳霖先生是张的同代人，而且共过事，彼此有看法是情理中事。金先生晚年高寿，说起旧时代的人和事，自然随便得很。但说张“玩政治”是言重了，虽然他说：“这里所谓的‘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但听惯了“玩政治”的人，还是容易误解，其实张东荪和金岳霖一样，都是真正的读书人，所不同处是关心政治的方式有异，比较起来，金先生的关心政治多西方色彩（专业和政治分得清），而张东荪则更近于中国传统文人。

40 年代末，张东荪的好友名报人俞颂华作《论张东荪》一文，盛赞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

张自己也多次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于党派生活的人”（《俞颂华文集》1991 年商务版）。俞颂华在文中还说张东荪“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照我看来，他的个性，的确不适于党派生活，在政治上他也确无丝毫野心与任何企图”。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 40 年代深论张的个性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俞颂华文集》）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张东荪后来的命运，也说明他与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事件是很难细说的，吴孝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张东荪与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注解中详述了张的遭遇（见《中国文化》第 10 期 210 页），但吴先生没有提到千家驹先生《七十年的经历》一书。该书专列一节“记张东荪案件”，叙述甚详。千家驹先生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的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该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该书 214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版）。张东荪晚年很苦闷，这苦闷，40 年代末，俞颂华就说过，后来

日甚。1960 年叶笃义向党交心时写的关于张东荪的材料中也透露出这种苦闷，叶是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说 :“ 同年 7 月党的 30 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家都欢欣鼓舞地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文章。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 沉默自由 ’。……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 ”(《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历页，1987 年中国文史版)。张东荪的同辈读书人中，如冯友兰、金岳霖都曾试图放弃自己的观点来适应新的环境，和他们比起来，张东荪是固执的。张在过去是很能写文章的，《观察》时期，已是 60 岁的人了，但文章还写得冲劲十足。《观察》在 4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关于“ 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 ” 争论。在这次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 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 ”，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 ;“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 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40 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 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 ”。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 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他认为 :“ 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 ; 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

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

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发展。

在这场关于“ 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 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

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 50 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

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1973 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 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 70 多首旧体诗。一代哲人，就这样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是 1886 年生人，1973 年该是 87 岁，自然年龄是高寿了，但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 1949 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 63 岁。

吴晗的悲剧

在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闻一多和吴晗的命运特别耐人寻味。闻一多人们说得很多了，这里我想说吴晗。

说到吴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与《海瑞罢官》的联系，想到他和“三

家村”的命运。

看过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深为他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但痛心之余，我又常常往别处想，他的悲剧命运固然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又是悲剧承受者个人的某些弱点，使悲剧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

我眼下正在做一个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课题，吴晗的命运常常使我陷入困惑，有时我实在不明白，像吴晗这样的读书人，怎么会一下子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出去，变成一个特殊的文人。在 1957 年的事件中，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和前辈，他过去的读书人形象很快消失了。吴晗不像傅雷，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曾有过努力放弃过去来适应新环境的追求，但吴晗比傅雷走得远，傅雷是绝望了，而吴晗是在希望中死去的，这是他更深的悲剧。

吴晗出身贫苦，在早年的读书生活中，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

在他前半生的学者生涯中，影响他最深的是胡适。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曾给胡适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因《胡应麟年谱》一稿，得到胡适的赏识，被推荐到清华读书。后来又受胡适的启发，专攻明史，终于卓有所成。胡适对青年吴晗的评价是："功力判断都不弱"，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极高的。青年吴晗和他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是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路，1950 年他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见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但吴晗在 40 年代初，思想开始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突然发生变化，有直接的现实原因，也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吴晗是 1909 年生人，40 年代初也不过 30 多岁，还在多变的年龄中。另外，在吴晗的思想变化中，当时中共南方局在昆明的地下负责人华冈的影响也很重要。这一点，吴晗的变化和闻一多有点类似，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我们先不说他们两人的个性，闻一多和吴晗的直接生活处境，在同时代大学教授中，是相对艰难的，这也是他们对现实比其他人更不满的直接原因。具体到吴晗，他是工读出身，用今天的话说，不是按部就班考入清华的，而是靠自己的才华，因已有的学术成就才进入的，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受到一些压抑。还有就是吴晗是没有留过洋的。当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当教授不是太容易，才聘他到云大当教授的，吴晗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吴晗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后来是介入政治较深的，也是官做得比较大的，以学者和文人身份做到副市长的，这在吴晗的朋友中几乎没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愿望，但一进入这样的环境，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多次给周恩来、彭真写信，要求回清华执教，但终于未能如愿，只好下决心做行政工作。

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 40 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是吴晗悲剧的深层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吴晗在 40 年代的古为今用尚有可取处，因为他的古为今用，是自己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但到了 50 年代末期，他的古为今用就把自己推向了绝境。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959 年 4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一次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由此想到了海瑞。

毛泽东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写写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给吴晗讲了，吴晗很快就写成了《海瑞骂皇帝》。毛泽东 4 月有写写海瑞的意思，吴晗 6 月 16 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直到《海瑞罢官》。《论海瑞》一文的开头就由“ 生死牌 ”说起。

吴晗是一介书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没有了。吴晗写海瑞，固然与他的专业有关，但似乎也犯不上为写而写，一个读书人，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做文章，早晚要出事。吴晗的失误，在于他太迷信了，太听话了，他要按别人的意图写，把自己的独立性丢了。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自己这篇《论海瑞》的文章送给一位参加会议的领导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给吴晗说了。吴晗在发表这篇文章前就加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结果吴晗还是没能逃出那场悲剧。

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50 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多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

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过去的教授

1995 年 3 月间，邵燕祥先生来太原参加一个会议，我前去拜访。记得邵先生曾和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极少谈起十年以前的事情，邵先生说不知这是什么缘故。回到家后，我一直没忘邵先生的话，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今天的年轻人，的确容易怀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我是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曾经对现实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每每失望。我有一段时间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倾注于当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但很快我就发现，我所了解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与我理想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很不同的。在这样的判断下，我终于放弃了研究报告文学，甚至放弃了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我个人的学术能力和兴趣而言，我是想从事一切有关当代作家的研究，但那些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品格和作品的内涵，总让我提不起精神来。无奈之下，我才选择了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太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最初留意《观察》周刊时，就是因为印在《观察》封面下方的“ 撰稿人 ”中几乎都是教授，再看他们的言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 士 ”气。当时我就想，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

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敢主持公道。当《观察》研究做完以后，我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进一步了解那一批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我想从故纸堆中重温他们州日梦。

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大学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正义鼓与呼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一回事。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不能主持公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显然不可能。

今日的大学教授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也不能全怪他们，这是时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联大的教授时，最留意大学教授的自由流动问题，我觉得这是使旧日大学教授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始终保持最佳的一个基本前提。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在过去是得到实现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 100 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 3 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请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很快就离开了，以鲁迅的性格，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又不能随意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因为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当年的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时情况很少。

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它的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个教授的经济地位，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我说一个梅贻琦执掌清华后的例子。梅贻琦掌管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 300 至 400 元，最高可达 500 元，同时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 120 至 200 元；助教为 80 至 140 元；一般职员 30 至 100 元；工人 9 至 25 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教授的收入

是一般工人的 20 倍。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差距是有道理的，就如一个家庭，主妇的收入不超过保姆的 10 倍以上，她很难管理好这个保姆。想到今日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有他们的苦楚。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听了就说 :“ 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遂夺门而去，这在当时是何等犯忌的事。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 :“ 扯淡，我就不入。” 也没人敢把他怎样。

抗战期间，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

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 :“ 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 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 :“ 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过去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连署宣言，批评不合理的规定。1942 年 5 月 17 日《大公报》“ 星期论文 ” 联名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 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 ”。他们认为 :“ 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 还是这批教授，在 40 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类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

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过去的教授也不光是敢说话，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

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 “ 特别办公费 ”，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 :“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

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遥想教授当年

1994 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 1939 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 1942 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

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 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

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常风先生

十多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两卷本的《英美散文六十家》，封面绿白相间，简洁淡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书署名为“高健编译，常风审校”。从译者的序中，不难看出他对常风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常风是谁？

常风先生 1995 年是整整 85 岁高龄了，但精神一直很好。去年重病一场，他已不能下床，但思维和记忆都好。

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挚朴，没有一点火气呢？

常风先生是 1933 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在 30 年代是很有名的书评家，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刘心皇的《沦陷区文学史》中都记载了常风先生当年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但这一切常风先生都是在他晚年才知道的，记得当我把这些有关资料拿给常先生看时，他总是平静地对我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常风先生在 30 年代初期帮助朱光潜先生办《文学杂志》，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是《文学杂志》从始到终的参与者。在《新月》将关门的前几期，他又是一位主要作者，写了书评和一篇很长的散文。抗战军兴。

常风先生留在北平，这一段时期他和周作人有过一些接触。40 年代常风先生出版了《弃余集》、《窥天集》，还有一本编好的《茅茨集》，由于时局的变化没能出版。常风先生 50 年代初由北京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57 年被划为右派。常风先生一回到山西即离开了文学界，没有参加过一次山西文学界的活动，山西文学界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这位 30 年代介入过中国文坛中心的评论家。常风先生对这一切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以他当年给《新月》、《大公报》写作的资历重新回到山西文学界，怎么可能呢？他的甘于寂寞，期待平安，一切以平常心待之的人生态度，换得了晚年的安康。

常风先生对关心他当年文字生涯的年轻一辈十分感激，每次见他他总要问起邵燕祥、姜德明、陈子善、韩石山……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陷区，接着又不能写了。1957 年以后，还说什么写作呢？晚年能写了，但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风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回忆周作人先生》、《回忆叶公超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我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不动了。

今年陆灏、赵丽雅二位要重印他的《弃余集》，常风先生还写了前言，对年轻一辈，常风先生总是在默默中表示自己的感激。

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

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二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冯比毛小 10 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 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 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

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 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人柏林后的大火，作于 1945 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集》第 3 卷 348 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些都还是个谜。

1946 年 2 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 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

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 1948 年 6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1993 年 2 期第 8 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 1948 年起，毛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

多历史变幻。

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 卷 6 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

1974 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 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 15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 3 本专著都完成于 1948 年底以前。"金先生于 1949 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

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 4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 50 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 255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问，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 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 4 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 年，金岳霖 28 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 年 12 月 4－5 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

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

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 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 1948 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 年 9 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 29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 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 页）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 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 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 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 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 年 12 月 25 日，郭沫

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

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

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

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

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 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 :“ 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 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 :“ 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 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 :“ 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 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 50 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 10 名教授，最高为 6 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 :“ 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 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在自然科学中，我对物理学有一点兴趣，我对物理学本身是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有关物理学家的传记，喜欢读一点物理学发展史之类的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中，我总觉得物理学家的内心更丰富，他们对世界、对人类、对现存社会秩序总保持着关心和具备着责任，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结晶永远有热情，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社会公正、言论自由等都很敏感，对战争对和平，对人道主义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都有着令人敬佩的见识。从事纯粹技术工作的人，很容易除了专业之外不再对其他事物保持热情，但物理学家似乎是个例外，物理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一致的，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奥本海默，还有中国的王淦昌、许良英等人，人们可以不懂他们的专业，但却不能不懂他们这些人所努力追求的东西。

我在做西南联大研究时，除了对当时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很敬佩之外，对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教授也有兴趣，我一直想从他们当中找一两个人来做个案分析，从中看看 40 年代那些专业与政治无关的教授对政治是什么态度。我首先想到了叶企孙和饶毓泰，想到了他们的死。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当年，他们两人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叶企孙在 40 年代还曾做过一

段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 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 年 3 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 10 月 16 日（1968 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 卷 3 期）

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和饶输泰作过比较，他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 Plasticity（塑性）。"（见刘克选、胡升华文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汤用彤的顾虑

我从旧书摊上拣得一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上册已不知散落何处。此书是 1944 年在重庆翻印的，所据初版本为 1938 年 6 月商务版。这本书是汤先生的传世名著。1955 年中华书局重印过，1962 年再印。1983 年作为"汤用彤论著集之一"又印过一次。前两次重印，汤先生都写了"重印后记"，特别是 1955 年版的后记，能见出当时汤先生的心态。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专业本身与政治分不开的，如搞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的那些学者，像钱端升、费孝通、吴景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汤均是 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的名著是 1938 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

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见该书 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

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13 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1955 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 119 页）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

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 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 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 32 开，一为大 32 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

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 17 通，陈寅恪的信 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 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 3 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 3 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 年 12 月 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

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3 个月后，1949 年 4 月 29 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6 册，2122～2133 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 206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 年 1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 118 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 69 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 1952 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 1992 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

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 40 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 3 大卷的《柳如是别传》，“ 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 166 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 10 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 1935 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 624、625 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顾颉刚的恐惧

1949 年，顾颉刚 57 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 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 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 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 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341 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 年，顾颉刚就说过：“ 我以 10 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 页）顾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 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 8 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 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 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 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

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 258 页；1986 年 5 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 3 个人最深，或者说，这 3 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 3 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

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 年 4 月 2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 年 7 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 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 50 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 6 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 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

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

入《古史辨》第 7 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 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 352 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 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 8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 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晚年贺麟

1982 年，已 80 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 1902 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 3 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 3 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 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 · 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 :“ 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 246 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 3 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 “ 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 ‘ 白俄 ’。”（《会通集》74 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 :“ 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 ‘ 红楼 ’ 帮助贺先生 ‘ 洗澡 ’ 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 ‘ 慷慨 ’，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 ”（《会通集》31 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 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 :“ 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 40 页）这是 1945 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 120 元。1984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 4 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 “ 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 :“ 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

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 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 1 卷第 16 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 1988 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 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旧时，中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曾经很活跃，比如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杨人楩、王造时、吴恩裕等人，这些学者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我在查阅《观察》周刊、《新路》周刊、《世纪评论》等刊物时，常见这些大学教授的言论。

后来政治学在中国消失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的消失，不仅耽

搁整整一代政治学的学者，使他们本人的学术生涯提前终止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消失，使中国人重新变得愚昧起来。我们常说某某东西对一个民族造成了伤害，我感觉政治学者的改业所带来的损失，要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曾和我的朋友丁东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在收集资料和分析“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时，我们明显地感到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况的贫乏。那一代青年无论对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等等的理解和评价，让人感到他们又是在黑暗中摸索，其实，他们的前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中断了。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

国内关于吴恩裕的资料不是很多，我由于视野有限，只查阅到红学界几位学者在 80 年代初期写的怀念文字。吴恩裕在新时代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他先后写了《曹雪芹的生平》、《关于曹雪芹》、《己卯本石头记新探》等，对红学做出了贡献。但是吴恩裕的本业却不是红学，而是哲学和政治学。他是 1933 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1936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在做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时候，在《客观》、《观察》、《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读到过他的许多关于政治学的专论，他也是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吴恩裕和储安平同岁，当时正是壮年，从国外回来，雄心勃勃，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吴恩裕特别强调民主的实现和国民教育程度的关系。说到吴恩裕，我特别想说他和哈罗德·拉斯基的关系。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不应当忘记这位费边主义的理论家。考察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也不应当忽视拉斯基的影响。3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有好几位是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出来的，如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吴恩裕等。40 年代储安平办《观察》周刊时，在外国人的文章中，以选择拉斯基的最多，而且每次署名都以教授相称，可见对他的尊敬。我不熟悉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但就我所见而言，我觉得研究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拉斯基大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吴恩裕在英国的时候，拉斯基是他论文的导师，而且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曾多次帮助过他。1945 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第 10 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详细介绍了他在英国做研究的情况。

从吴恩裕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出他自己的学术兴趣。他的专业是哲学，但他初到英国的时候，考取的是读历史的留英公费生，如果改习哲学，将不能获得公费。为此他曾苦恼过。“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人胜。”正是在这种苦闷中，他找到了拉斯基，学习政治学，此后即以此为自己的专业。吴恩裕年轻的时候，对历史持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想见，50 年代以后，他改做《红楼梦》研究是迫不得已的。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再允许研究，无奈之下只得另寻别路。1949 年前，吴恩裕已经完成了《西洋政治思想史》（1947 年）、《政治学问题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1954 年）、《唯物史观精义》（1947 年）等，已经是一个对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后来偏离了他的学术兴趣。我不知道吴恩裕早年是否就

对《红楼梦》有兴趣，但从《客观》和《观察》上的文章看，他是对民主宪政和社会进步抱有热情的。他在《客观》周刊写过《实行民主不能忽视教育》（4 期)、《关于奥斯丁主权的讨论》(12 期)、《认识政治与认识民主》(14期）等，在《观察》周刊写过《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论人性与私产》、《国家与道德》、《自由乎平等乎》、《法律道德与大家利益》、《一个历史的教训》、《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社会契约论》、《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等等，都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内。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比起来，吴恩裕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是抗战以后才学成归来的，40 年代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像他的同辈朋友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一样，他们在 40 岁以后，已经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了，想来真是痛心。几乎两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以 1900 年和 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些知识分子为代表)，在他们 50岁和 40 岁的时候，失去专心治学的时光，真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损失，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受过中西两面学术训练的学者。吴恩裕还做了红学研究，更多的学者则是什么都不能干了。

失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在《大公报》的历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报》的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来，他算是晚一辈的人，但由于王芸生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研究《大公报》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报》的前 3 位创始人，除张季鸾 1941 年逝世外，其余两位都离开了大陆，留下来的王芸生，成了这一代报人中一个失望的典型。

要说王芸生，不能不说中国过去的新闻传统和新闻实践。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里，报纸和刊物是新闻的基本传播方式。旧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个人认为在《大公报》身上已经很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它的基本经营方式上，更主要体现在它所具备的现代新闻观念上。初期《大公报》即能确定“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的四不方针，预示了它日后的成功，加上他后来形成的“ 文人论政 ”的办报思想，可以说代表了特定阶段内中国新闻发展的最高水平，它在新闻实践上所达到的水平，是日后报纸不易企及的。

《大公报》初期的两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均是留日的学生，有开阔的视野和现代眼光，他们办《大公报》是照英国《泰晤士报》的路子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公报》的基本路子。我曾用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图书馆翻阅过影印的《大公报》(天津版)，我感到它所积累的经验和达到的水平，足以给现在的新闻从业者提供借鉴。

解放前，论日报，我以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最高水平，论周刊，要算 40 年代末储安平的《观察》，围绕这一报一刊的实际是当时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最活跃的一群。当时列在《观察》封面上的撰稿人中，论工作范围，最集中的就是《大公报》了，计有李纯青、许君远、徐盈、杨刚、萧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大公报》的名记者兼《观察》的撰稿人，竟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40 年代末部分知识分子

的思想倾向，就连萧乾本人也说过，他当时算是中间偏左的。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 3 人前后的经历和命运，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缩影。

共和国成立之初，王芸生还不到 50 岁。1929 年，王芸生因和张季鸾打笔仗，被张发现邀入《大公报》，很快受到张季鸾的赏识，成为《大公报》的一支笔。《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笔，不知写下了多少好文章。名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说："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人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多数民意脱节。"（《俞颂华文集》第 311 页，商务印书馆 1991 年）像王芸生那样的社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当年他所写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文，虽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周对王芸生文章的评价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周恩来书信集》第 19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另外像《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更是传诵一时。李纯青对王芸生的评价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短处是骄蹇自满，独断独行，很少听人意见，更不受人指挥。他只尊敬两个人，一是张季鸾，二是陈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泻，能引人入胜，但对问题并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质。"（《笔耕五十年》第 509 页，三联版）"而社论则由于王芸生一人操纵或指挥写作。当然，它也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这话有点过饰。

但《大公报》社论确实也包含着王芸生个人的书生之见。"（同上 526 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上 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 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李纯青曾回忆过 1948 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

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 532 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大公报史》第 252 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 107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 510 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恪当年的选择也有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 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 535 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 535 页）可以看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49 年 6 月 17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检讨了大公报近 50 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公报与现代中国》第 708 页，重庆出版社 1993 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上 535 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 97 辑第 77 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

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 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 16 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 年只有 6.3 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 97 辑第 81 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 年报社内虽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 81 页)

1957 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 年第 4 期第 58 页）1957 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

据说 70 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

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60 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 年至 1949 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 25。28 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 32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 1957 年的厄运。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

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

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 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

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 3 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 年魏建功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

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1994 年 2 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 1928 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 年，26 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 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 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共 6 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 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

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

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

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术，

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

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 1946 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 10 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参预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上的贡献都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是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 25 封，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 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

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册 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 ”（《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 1646 页，1985 年 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 私淑弟子 ”。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 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 273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而现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 :“ 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 :‘ 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 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 353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去寻找。1956 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 359 页）。但在 50 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 中央研究院 ”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 512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了 20 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

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左金右于）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 382 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个人的特点，如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 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 7 卷第 499 页，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1949 年，王瑶是 36 岁。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小 4 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 12 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王瑶 32 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 年 1 月 29 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 4 位。

同年 4 月 4 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 112、11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

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瑶先生纪念集》1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 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 13 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气质。王瑶在 1935 年加入共产党，40 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人。1948 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文集》497 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集》507 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

的自我批判》，在 50 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该书下册 1118－1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王瑶当时的处境，从他 1951 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文集》602 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 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 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 页）痛哉斯言！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

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

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 1910 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的一位，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

吴忠匡曾说“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钱给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小引，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1988 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 40 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来说已经赶不上

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 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到的，可见 80 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

‘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所以尽管是朋友，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

再说张东荪

我在《旧人旧事》一书中曾写过一篇关于张东荪的文章，这之后，又陆续看到一些资料，由于各种人说的张东荪都是自己了解的一面，所以关于张东荪的形象也就各异。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是常事，但具体到张东荪来说，人们之所以各执一词，却多是因为关于他 50 年代初的经历本身就没有人能说清，而这种说不清楚，并非由于资料的缺乏，实在是因为有关的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张东荪出事在 1951 年，距今已 40 多年，按《档案法》30 年解密的规定，本也应该能够供研究者查阅，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一件本来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却一直说不清楚呢？这很给研究历史的人留下了想像的余地。

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单列一节专说张东荪案件，据千家驹说："我曾受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托，整理张东荪的叛国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他的报告书，因此得以见到全部档案材料和张东荪的亲笔信件，故对诸案经过知道得比较清楚。事隔多年，虽文字上可能有所出入，但基本情节相信是不会错的。"（该书 214 页）根据千家驹的说法，他算是处理张东荪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之一，那么他所记述的张东荪事件是有一定可靠性的，但千家驹 1986 年写作的这本回忆录是有局限的，或者说是有偏见的，比如他说："原来张东荪不仅历史上一贯反共，还当过汉奸，不过自己不出面，做汉奸的幕后军师而已。"（213 页）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当时为了糟踏张东荪而使用的各种未加证实的材料当作结论了。事实上，在敌伪时期，张东荪坐了 6 个月日本人的监狱。他的这一段经历，1947 年出版的《观察》周刊曾连载过他自己写的《狱中生活简记》（2 卷 13—17 期），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至于张东荪在过去和共产党的关系，人们也很清楚，至少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多次与中共打过交道，如果他"一贯反共"，1949 年也就不会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了。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作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中间人，也是人所共知的，他可以说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劳的。1949 年 1 月 1 日，中央军委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 6 点方针的电报中就明确说："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55 页，北京出版社）另一封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中，也多次提到张东荪："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同上 58、59 页）千家驹回忆录中提到张东荪的事，有些是当时压力下有人随意揭发的，有些是张在压力下所做的检讨，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由于张东荪的历史档案不公开，所以千家驹的回忆被很多人引述，因而也造成了对张东荪的误解。

关于张东荪事件的主要内容，千家驹的回忆是这样的："据王某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我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他把消息透露给王某，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213 页）目前，有关张东荪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有唐振常先生、吴小如两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回忆张东荪的文章，但对他的判国罪，无一说得清楚。张中行在《负喧琐话续编》中也有一节忆张东荪的文字，对此

也语焉不详，为什么这些同时代的人都说不清当时的情况呢？可见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该书 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国文化》第 10 期 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 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 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 卷 13 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负暄琐话续编》24 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俞颂华文集》320 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 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增刊第 2 册第 30 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

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 1951 年，还能躲过 1957 年吗？

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 三反 ”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 :“ 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422 页）1952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约见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

梁漱溟说 :“ 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 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 60 名委员之一，殊‘ 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对张‘ 既恨之，又悯之 ’，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 :“ 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206 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 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 年张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 4 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 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

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 20 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 年 9 月 3 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 :“ 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

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346 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 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 年 3 月 20 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 册第 38 页）1931 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 968 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 4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 年 12 月 12 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 15 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 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 16 册）可以说，从 50 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 年 1 月 24 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 17 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 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 8 册 3102 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 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

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 130 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 3 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 10 册 2556 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 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 1948 年 2 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 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 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 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 年 5 月 17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 1934 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 173 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6 页）还有一点是，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

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 496 页，群众出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年最有资望。

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71 页），容庚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 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

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吴世昌的选择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 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

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

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 1971 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

"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

他在燕大前后学习 7 年，前 4 年是英文系学生，后 3 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 37 页，北京出版社，1980 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

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 年 11 月 17 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 4 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276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 27 岁，胡适已 44 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 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 280 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

《胡适的日记》在 1933 年 12 月 30 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 年 2 月 13 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 11 册，1990 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 281 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 10 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 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 1 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 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 17 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 期）《思想复员论》（3 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 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 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 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

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 1948 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 12 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 13 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 12 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 12 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 12 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 12 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 12 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 13 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 12 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 10 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 3 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 年 9 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 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 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 卷 16 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 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 40 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 60 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 年 1 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

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 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 40 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 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 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 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 40 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 4 年后，“ 文革 ” 开始，“ 吴世昌进 ‘ 牛棚 ’、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 我在奉和其 70 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 ‘ 金印大如斗 ’ 一事，而先生则说：‘ 此事不说也罢了。’ 所谓 ‘ 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 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 75 页）

1986 年 8 月 31 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 78 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或者是他和林徽因的浪漫人生。今天生活在北京的人，也许更加怀念这位建筑学家，如果北京城的规划能按梁思成的思路去办，北京将是一座文物城市。然而这

一切都不可能了，人们拆墙的时候，不会想到他，推倒牌楼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那是一个一切新的都好，一切旧的都糟的时代，梁思成是无能为力的。今天回头一想，人们只好叹息。当时的气氛下，拆了城墙，推倒牌楼，还算是走得不远，要是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连故宫也应该拆掉。我在 1955 年 10 月的《学习》杂志上，读到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何祚庥），文中这样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见该杂志 17 页）我读到这里，就好像有些理解梁思成了，他一介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还有什么呢？

过去梁思成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以梁思成的家庭背景和留美经历，以及当年与中国知识界的交往，他不应该退得那么快，或者说，跟得那么紧。1952 年梁思成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害》（4 月 18 日），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能泼的污水全都浇到自己的身上，好像自己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抛弃的，一个读书人写文章自我作贱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但这类文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留学欧美经历的知识分子身上，几乎是很平常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有写过这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读的时候，我先怀疑是否他们亲笔所为，再是怀疑这类文章可能都是组织上逼出来的。这些文章虽然各有角度，但几乎都像是一个人做的。梁思成 1952 年写的这类文章肯定不止这一篇，这一关他算是逃过来了。

经过这一番洗澡，梁思成按说该是一个新人了，但奇怪的是 1954 年梁思成在当时《新建设》、《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建筑的学术论文又差不多都是坚持自己固有的观点，甚至就是在 1952 年，一方面接受思想改造，一方面他又说过："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适履。"这样的话，在当年是多么不合时宜呀。从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像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固然可以在表面上顺应，甚至公开表态，写文章作贱自己，但在内心深处，那些融入血脉的东西，是不愿或想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梁思成是这样，其他人也大体如此，而且有时你会发现，在当时愈是毫无遮拦作贱自己的知识分子，内心好像愈顽固，我有时就想，也许他们早已把那种作贱自己看成一种无法不进行的游戏了，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方面反省自己，一方面又还在使用自己旧有的武器。

1955 年前后，梁思成的建筑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随后而来的 1957 年，梁思成也逃过来了。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有些文章又让人想起 1952 年他自我批判的时候，不过这回他批判的多是当年自己的朋友，比如他就从《新月》的旧账里拿出一些东西，批判罗隆基。这一年夏天，真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中度过的。眼见着自己早年的朋友一个个从政坛和学界消失，梁思成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呢？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1959 年，梁思成在第 19 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十年》，文章一开始就说："1949～1959：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 10 年！多么幸福的 10 年。"（17 页）文中还引述自己写的一首诗："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时期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发生过了，《武训传》也批判过了，还有胡适，再加一个胡风，这样就到了 1957 年。隔过

一个大跃进，梁思成就写出了前面这篇文章。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出身名门，修养极好的大学教授在自己感到万分幸福的时候，难道他的内心就没有波澜吗？这是梁思成的困惑，同样也是我们想走近梁思成的人的困惑。

晚年曹禺

在今年第 3 期的《收获》杂志上，我读到曹禺的女儿万方写的回忆他父亲的文章《灵魂的石头》，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后，我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怀念文字，当然这与作者的特殊地位有关，作为女儿，万方是理解自己父亲的，她用真诚的心灵，写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我以为从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两个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不光是他们在文学上独特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二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虽是两种结局，但内心深处的悲凉是一致的。

我曾听到一位曹禺在清华的同班同学说起过曹禺在清华的一些旧事，这位老人对曹禺在文学上的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个性却留有余地。我理解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触发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几件让知识分子不理解的事，尽管只是写几个字，签个名之类的小事，但由于他出身清华又多年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这失望，读了万方的文章，人们又会多少能体味到他晚年的处境，其实他晚年的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剧作家，曹禺在 40 岁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 1910 年生，之后，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能再发挥出来，无论是 50 年代的《明朗的天》还是 70 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让人感到这不再是当年的曹禺了。对于曹禺 40 岁以后的创作，他的朋友吴祖光有过尖锐的批评，意谓他是太听话了。而黄永玉的批评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以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田本相《曹禺传》472 页）。晚辈剧作家沙叶新也曾直言批评过曹禺的没有主见。

对于朋友和晚辈的批评，曹禺是从内心接受的，而且他还把黄永玉给他的信装裱成册，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在他生前终于没有得到爆发，他在平静中怀着痛苦离去，据说他本来还要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继续扮演一个早已厌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没有再给他这一次机会……

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从冯友兰、钱端升到曹禺、钱钟书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

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 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 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 40 岁以后赶上了一个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但 40 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说起：我已经 80 多岁了，90 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 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 90 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

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 10 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旭麓是 1918 年生人，比王瑶小 5 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 1949 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 50 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 年代初，在学术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这样的特点。

1949 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 24 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40 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 2 卷第 21 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这篇文章写于 1947 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 29 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 也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

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 1949 年 10 月起至 1965 年 8 月，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59 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 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 555 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 2 期），我是别有一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寅恪所不选择的东西。这一代学者不管后来命运如何，他们在过去已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代人固然是一个耀眼的群落，但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他们呈现的是另一种悲剧。我在阅读舒芜先生的回忆时，有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脑中浮现，冯友兰他们是一代，中间储安平、费孝通、王瑶他们又是一代，在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又可按那个时代流行的说法，每代人中，又有左面的和右面的。虽然当年的人生道路有别，但在命运的悲剧性方面，又可说是殊途同归。在他们这两代人之后，更有一类人的命运充满复杂性，这就是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

舒芜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显示了另一种更深的悲剧。这一代本世纪 2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在获取知识的最佳年龄，差不多没有赶上什么好时候。舒芜的经历在同时代人中又有特殊性。舒芜出身世家，从他以后做出的学术成就看，他本来是一个在学术上早熟或者说早年求知渴

望特别强烈的人。但舒芜这样有才华的人，却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没有能够进入当时的大学读书，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学者。舒芜的未能进人大学，自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可以先设想一下，如果具有这种气质的舒芜，在那个时代能进入当时中国著名的学府，先去接触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那些教授，那么他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理解就会和后来不一样。按舒芜的年龄（1922 年出生），他是能赶上这个时代最后一批自由主义学生的行列的。而舒芜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烈的时候，却在当时的安庆中学遇到了表兄姚圻，舒芜说："我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风行，可以说是一代青年学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姚圻带来的书里面，却无此书，而有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厚厚一大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第一本读的就是它。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我，觉得这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我努力啃了一两遍，自以为有所得。进而读了姚圻带来的其它马克思主义的书，更进而自己跑书店，搜读各种马克思主义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理论纲领政策的书刊。"当时舒芜还读了徐懋庸译的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革命领袖人物传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 40 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依赖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是否也会值得反抗？他们还未深思。

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 40 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

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

1949 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到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的"个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

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范文澜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和反右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和"反右学"的研究，现在有了许多成果，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

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将被冲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反右中的资料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1949 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忽略此点，由于时间的推移，将使后人难以分辨这些文字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和反右时，常常简单地依靠已公开的文字资料，并以此为据推断许多事件，这些研究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觉得很隔膜。比如在 50 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 页）范文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 50 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说到周扬。

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

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但了解 50 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谨慎态度的。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

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 年，“香港陈某寄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退还。”（该书 170 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歇己》，辽沈书社版）陈寅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 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 50 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解 50 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 1950 年 6 月 1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 6 月北大毕业） 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是题“五四”。

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

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

…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土改，

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诸先生默默无语。（《日记》

第 16 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 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惧的。1951 年 11 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

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 年 7 月 8 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 1950 年 5 月 4 日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 罗常培亦非常热心 ”的判断是准确的；说“ 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默默无语 ”，也是真实的。特别是周炳琳表现得很有个性。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中的批语中写到：

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

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

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

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册第 422 页）

其中所谓“ 对周炳琳的作法 ”是指，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于“ 三反 ”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周炳琳谈话，张奚若、马寅初和周炳琳谈话以后，并由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做思想检讨。

从林诒昌对几位教授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 50 年代初，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希望转变，比如像梁漱溟，陈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过抵制行为。如梁漱溟当时就“ 不肯洗脑 ”，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说：

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民国八年发愤自杀（也许是七年尾），原因

不明，但大致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

“殉道者 ” （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 不能向不通处变 ”不能

“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 ”都是很可敬的。（《日记》第 17 册）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陈寅恪那样的人太少，加之外力过于强大，这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地屈从了，但内心并非彻底认同，为了生存下去，他们终于成了无奈的一群。对于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

胡适多数予以谅解，因为他知道这是压力之下的结果。1952 年下半年，他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的前言中，特别举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他说："……他的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 6 册第 2293 页）给胡写信的林治昌是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到了香港。《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他 1948 年 3 月 18 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信中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和对胡适寄予的厚望，林诒昌当时还没有毕业，是一个青年，他对时局的清醒判断，说明 40 年代末许多青年学生，是理解和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他在信中说：

先生应该知道：国家确需要你，希望你会为中国开创一个民主的传统，

人民确需要你，希望你将民主精神播送给他们。在今天中国，你最有资格，

因而也最有责任去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第 353 页)

以小见大

读《中国院士》(张建伟、邓琼琼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想过收集中央研究院的资料，这个兴趣最初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引起的，后来听说南京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的书，我也曾打听过，但此书至今没有出版。由于有了这点准备，平时看书对有关中央研究院的史料也就比较留意。

现在读《中国院士》，自然就很有兴趣。大体上说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我对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就是作者似乎有一种乐观主义的倾向，所以在他们笔下，中国院士的历史也是越往后越辉煌。在作者看来，尽管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总是光明的。作者自有其道理，但我觉得他们的乐观主义是太多了一些，这本书如果多传达一些历史的悲观主义，也许才更让人钦佩作者的历史眼光，可惜作者没有这样做。虽然这本书中有很宝贵的史料，偶尔也有很感人的细节，可惜由于作者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所以尽管是本好书，但还不能对人的心灵真正有所触动。

如果给作者提具体意见，我想先从一个细节说起。作者在书中写到了生物学家胡步曾，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的 81 名院士中，胡先生是生物组的院士，1955 年的学部委员中就缺了胡先生，因为他反对李森科那一套，在 50 年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像这样的细节书中还有一些，可惜作者未能从这些细节中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我说他们有乐观主义的东西，因为他们忽略了这种小事中映现出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特色，他们把本来已经找到的历史感觉，轻易放过去了。《竺可桢日记》中有一个细节，恰好可以和胡先生的经历对比着看，对比着想。1949 年 5 月 30 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兼收能并蓄。"(日记第 2 册第 1257 页）从《中国院士》所写的历史看，作者读过竺可桢的日记，可惜把这样好的细节给遗漏了。1947 年 5 月 22 日的

胡适日记中，留下了一份关于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的名单，抄出如下：

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 人文组 ”的“ 人文 ”部分的拟提名单：

哲学：吴敬恒　汤用彤　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　杨树达　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　郭沫若　李济　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 15 册）

这是 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中的沈兼士、傅增湘，1948 年就没有当选院士，但郭沫若始终在这个名单上，所以才有竺可桢见陈毅后的感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124 页）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细节，何廉曾为蒋介石提供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员名单，他说：

我们拟就了一张名单，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上海见他时，我们递

交了这张名单的草案。我记得，名单上有郭沫若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清楚

他是个共产党人。蒋介石看到郭沫若的名字后说：“ 啊，好得很，我对此

人总是十分清楚的。” 他问我们此人现在哪里，我说 1933 年在东京时我曾

看到过他，但不了解他现在何处。

历史常是由许多小事构成的。研究历史的人可以从大处着眼，但也有专从小处着眼的，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那些学者，像布罗代尔就喜欢看小处，也能成一家之言，而且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院士》的作者，本来已经有了很好的材料，但眼光偏了，作品的深度也就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很希望作者能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学点把握真实历史的方法和情感，

三个教授的命运

1945 年昆明发生的“ 一二・一 ”学潮，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这次学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选取的角度是观察这次学潮中的三个教授的命运。

“一二・一 ”学潮起因于一次时事晚会。1945 年 11 月 25 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这次晚会，成了“ 一二・一 ”学潮的导火索。当时参加时事晚会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约 6000 人。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惯例，学生的时事晚会，通常要请知名的教授来演讲，11 月 25 日的时事晚会也不例外，同学请了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 4 位教授讲演。晚会进行当中，驻防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人包围了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晚会之后，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 7

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赴捕捉，匪徒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92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这则不实的消息，引起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4 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这次学潮前在时事晚会讲演的 4 位教授当时的经历和以后的命运。

出席时事晚会的 4 位教授除经济学家伍启元 1949 年后离开大陆赴美外，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来。1988 年 11 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校庆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伍启元以《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为题发表了讲话。（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编《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 50 周年纪念集》105 页，1988 年。）由于伍启元离开大陆多年，他本人的命运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不同，因而我们只观察钱端升、费孝通和潘大逵的命运。

钱端升 1900 年出生于上海，1919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2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潘大逵 1902 年出生于四川开县，1924 清华学校毕业，1929 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费孝通 1910 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1933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 年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三位教授从年龄上看，大体是三代知识分子，钱端升长费孝通 10 岁，而潘大逵又长费孝通 8 岁。三位教授同出清华，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离不开胡适，现在我先比较他们和胡适的关系。

一

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湾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都和胡适发生过联系。尽管胡适没有执教西南联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灵魂。1940 年钱端升曾有一信给胡适，详细述及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情况，其中说：“联大经四月扰攘，现仍定不迁。惟一年级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联大内部亦因此事发生 moral（风纪）方面许多不良影响，可惜也。附件拟请抽暇一阅。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嘘。

弟既无书可读，又苦无事可做，致有此尝试。兄得无笑其少不更事，无苦讨苦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494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钱端升是了解胡适的，虽然身在国外，但仍时时记挂他在西南联大的那班朋友。钱端升与胡适相差不到 10 岁，他们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而且私交甚好。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就是钱端升。张忠绂在《迷惘集》中曾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 900 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谢绝领月薪。”（张忠绂《迷惘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可见他与胡适的关系。钱端升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胡适的崇拜者。1962 年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适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是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

来，就干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509 页）钱端升在信中还表达了当时清华同人以及校外的《现代评论》派那班人对胡适寄予的厚望。

钱端升早年和胡适建立的友谊是很深的，从他写给胡适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适的；但在钱端升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又感到他对胡适的敬重并未成为他的行动，这可能是当时胡适许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点。1948 年钱端升赴美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也劝过他留下，但钱端升这次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而且是新时代初期发言较为积极的知识分子，他那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1951 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钱端升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全面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过去，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将蔡元培早年领导北大时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给否定了，他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74 页，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2 年）像他同时代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钱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状况来推断后来的言论，这之间呈现出的是简单跳跃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进规律的。

“一二·一”之前的时事晚会上，作为国民党员的钱端升讲演的宗旨是反内战，反极权，反专制，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并没有过了多久，钱端升就失去了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50 年代初期，他写的为数不多的阐释新时代宪法和国家机构的一些文章，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1941 年钱端升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起当时昆明的情形“国内有三大事，即国共争，物价涨，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样。然弟所见，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无论共或反共，均是 totalitarian（极权主义者），亦是不愿入轨道者，其余更可知，奈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401 页）40 年代晚期，40 多岁的钱端升曾参加过旧政协，作为一个宪法专家，他可能对联合政府的承诺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为这个承诺在 40 年代的确是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1957 年钱端升成了右派。

60 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还很关心钱端升，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10 册 2556 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0 年。）当 60 年代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这里面一些年轻——40 来岁的如陈达（人口专家）等，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同上，第 10 册 3844 页）可见对钱端升的关心。）

二

费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适发生联系的事，目前我们知道的不多，费孝通小胡适 11 岁，已是两代人。虽然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适当年办《独

立评论》、《现代评论》和《新月》时的许多朋友，有些是费孝通的师长，有些则是他的朋友。费孝通本人的思想，虽然在 40 年代末给人留下了向左转的倾向，但当时费孝通的左转并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转只是偶然顺应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势力。

就他一生的言论而言，反专制、反独裁是他的本意。费孝通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虽然后来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评价。

1988 年，在谈到与民盟的关系时，费孝通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我与民盟》9 页，群言出版社 1991 年 4 月)

费孝通对胡适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适的日记》中曾记有 1943 年费孝通赴美时拜会胡适的情况，胡适说："费孝通教授来谈，他谈及国内民生状况，及军队之苦况，使我叹息。他说，他的村子里就有军队，故知其详情，每日每人可领 24 两米，但总不够额，每月 35 元，买柴都不够，何况买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纪律哪能不坏？他说，社会与政府仍不把兵士当做人看待！兵官每月 400 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第 15 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0 年) 另外能举出的例子是我做《观察》周刊研究时，见到的胡适写给费孝通的一封短信。这封信是费孝通交给当时《观察》周刊编者储安平发表的，这信一般的胡适书信选中都漏收了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该书未收胡适致费孝通的信)。这封信是胡适读了费孝通翻译的《美国人的性格》，发现其中的两处错误，主动写信告诉费孝通的。以下是胡适信的全文：(《观察》第 3 卷第 4 期第 23 页，观察社 1947 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 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 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 North 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 Lord 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耻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觉得

朋友有切嗟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费孝通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很快回信表示感谢，从那封信，可以看出费孝通对胡适的敬重。写那封信的时间是 1947 年 9 月 10 日，据这个时间推测费孝通的思想倾向，按流行的说法，他已经是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了，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我们能感到胡适在费孝通的心中还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费孝通的信是这样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232－233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

适之老师：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

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

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

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来标榜， 用意是想去歪曲 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

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

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

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

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 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1949 年 8 月 31 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 年 8 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

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我这一年》3－4 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 1949 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40 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 40 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而已。从 50 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 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 年费孝通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 1992 年 6 月），也没有提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较高的一位，1957 年潘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 4 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

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 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 40 年代末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而将当时讲演的 4 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国 40 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4 个教授除了伍启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 3 个全都没过了 1957 年这一关，而这 3 个教授同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 40 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出反专制反极权；3 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 40 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 2 卷第 10 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

当时是 1948 年 12 月 28 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 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 40 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

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为什么怀旧

1995 年 11 月底，我为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曾去昆明一次，当时恰好许多西南联大校友回昆明，纪念“一二·一”运动 50 周年和西南联大校庆，我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交谈，听他们回忆和遐想，几乎每日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这些联大的学生那么容易怀旧，容易被往事牵走……后来我整理资料，看许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好像能理解一点他们的情绪，因为那些岁月中毕竟有美好的东西。他们都已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但他们怀念的也仅是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

人老了是容易怀旧的，但所能忆起的，多数是温馨的往事，不是一切过去都可以成为回忆的，就说那些联大学生，为什么不怀念 50 年代 60 年代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

我这几日正读张冠生先生的一本书，名为《乡土足音》，这本书是写费孝通的。费孝通晚年，特别怀旧，我过去读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强烈，这次读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 年 9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 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

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常常怀旧。

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钟书 1937 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 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 9 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 11 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 18 朗 193 页）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

1939 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钟书传稿》)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位钱钟书十分惭愧。

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贻琦写信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 18 期）可见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倍》中抄了吴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 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的ContemporaryNovelRenaissanceLiterature 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 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

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 年 11 月 4 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钟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果说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书。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 30 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些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反认故乡是他乡

这一两年的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乱哄方哄你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稍有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口吻，思维的路向，不是将他乡认为故乡，而是倒过来，反认故乡是他乡。

稍有历史感的人知道，今天读书人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和过去不同，这个过去，恐不是 10 年，20 年，而是更早些。那时的读书人，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除少数另有图谋的人外，多数读书人是从当下自己的处境出发说话的，无论说出的话是左还是右，几十年之后，人们再听到，还是以为那是真话。比如，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这个人就很有意思，1948 年，他在上海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民盟开除了，一直

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他过去是清华的教授，是朱德、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两句话，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的，说他们现在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而他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话的，不管当时战与和对谁有利，他觉得打下去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所以他要呼吁和平。这大体是旧读书人说话的基本态度。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许多人说话的态度就很让人奇怪，他们说出来的问题，细细想来，多数是假问题，他们津津乐道，其实是忘了自己说话的处境，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的。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那些主张人文精神的念书人很尴尬，而使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人如鱼得水。市场经济曾经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呼喊而来的，现在他们又大叫狼来了。说这话的人，也是念书人。我就想问一句，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喊来的，就算这个已经到来的市场经济有他们的功劳，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说人文知识分子眼红王朔们手里的那俩钱，未免太看轻中国的读书人了，现在王朔们是先富起来了，但如果把问题放在谁的年收入高之类的水平上，念书人还有什么话说？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想要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大家的。念书人的这点理想，简单说，就是如下这个道理：如果一个工厂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话，前提是这个工人有权利自己办工厂（如果他愿意和有足够的能力），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或者对王朔们来说，这个权利已经到手了，但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他晚年作了《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第 7 册是关于现代哲学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三松堂全集》，这一册排在第 12 卷，但以后的都出了，不是要钱，而是要他们的理想。忘记了这个，就太错怪今日的念书人了。

最近又有人写文章，阐述什么是文明，提醒人们：西方文明救不了东方文明。这个问题很大，但现在说这样的问题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我要问，谁主张过西方文明可以救东方文明？其次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奢谈什么文明无所优劣的高论，真有一种不帮自家兄弟说话的味道。这也是典型的反认故乡是他乡。

中国知识界，很有一些人自觉地将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一笔掠过。所以思考问题或是评价自己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所获取的成就时，总让人有反认故乡是他乡的感觉。

我们有一位作家，前两年写文章，说自己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少多少种外国文字。言语中显得非常得意，意思是自己的作品已获得国际声望，企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获奖的心情，情透纸背。这个作家是以反左为自己的责任的，这很好。但他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成就上，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怪圈。

这实际是一个常识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写作的。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文学作品，那么结论只有两个；一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扼杀文学的，二是所谓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一些自然科学家就能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与国际上同类学科对话，为什么到了一些作家那里，一方面自己在那样的环

境下受了多少苦难，而一方面又盲目地夸大自己的所谓文学成就呢？还有一个常识问题，也常为他们自己所忘记，那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被意识形态所允许变成铅字的，发出真正独立的声音，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

前苏联有两部小说，一部叫《你到底要什么》，一部叫《活下去，但要记住》，这两部小说我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书的两种不同译法，但我很喜欢这两个书名。我算不上什么念书人，但喜欢看，喜欢听。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你到底要什么。这在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是被误解的，被误解是因为有些话没有说明白，尽管大家心里是清楚的。

自欺欺人

今日文坛和学界的风气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改变还不能说彻底。什么风气呢？比如文人写文章，尤其是批评文章，总不大愿把被批评者的真名实姓写出来，这其实有违最起码的批评规则。有时是作者写了，编辑怕惹事；就改为某某，或干脆用×××代替，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学界和文坛难道就不能向过去文坛那样，有话直说，直呼其名吗？

许多读者读到这种地方，总感到很别扭。去年我在《黄河》杂志上编发过一篇《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是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的。收到文章后，我见其中就有多处×××，我本想为他标出来，但一想到作者既然这样，总有他的道理，就姑妄听之吧。但文章刊出后，不止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这是何苦呢？想看这类文章的人，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说谁，不想看的，你就写出来他也不懂，害得我还得再三解释。今年 2 期《读书》上有王蒙一篇说丁玲的文章，其中也有多处某某，我不知这是王蒙原文，还是编辑的用心，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读书》的读者，哪个不知道一点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何苦用那个××呢？更奇怪的是《王瑶文集》第 7 卷收录了王先生 1955 年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从错谈中汲取教训》，文中多处出现“胡风分子×××对我的书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想为王瑶先生避讳点什么，故意隐去了那个人的真名，但买《王瑶文集》的人，哪个不知道这里的×××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呢？这样难道就能为王瑶先生遮盖点什么吗？王瑶先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文章避讳过，他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是一说一，是二说二。现在有许多编辑，不知从哪里来的警觉，结果尽干自欺欺人的事，这种多余的自律行为着实害人不浅。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

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场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 1948 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 9 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 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 40 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清一色，是打麻将的人追求的，但文坛毕竟不是牌局，我想所有耍笔杆子的人，是不愿看到清一色的局面的。

有论战是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需要定一点规矩，谁来定这个规矩呢？我看就是卷入论战，或者挑起笔仗的人自己。笔仗在抽象的意义上就是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没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论战的规则，现在已近似于社会公理，已成为文人的基本道德，缺了这个德，不按这个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好无话可说，就像流氓唾在绅士身上一样，绅士是不能和流氓论理的，就是论，当下输的肯定是绅士，但旁观者则是清楚的，因为和流氓论理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事，谁要遇上这样的事，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论战的规则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一是挑起笔仗的人，你写文章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随便造一个名字出来。因为论战是要有回声的，你不署真名，让回击你的人去和谁论理呢？你既然敢挑起笔战，按理说你不但不怕对方回应，而且应该是期盼对方回应的，真理愈辩愈明嘛。你现在署一个假名字，又想攻击别人，但又不敢坦然走到论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 年前，储安平办《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是一个敢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到一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

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

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

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学者的道德

前两年我见到一篇书评，是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就有关南极问题研究抄袭一位西方学者的专著，这篇文章是用对勘法做的，我虽是外行，但看得出抄袭者的技巧。

还有一位上海某大学的学者，我至少见到两篇文章揭露他的语言学研

究，是抄袭外国学者的。但最近我见到一位从上海来的学者，说到这位抄袭者，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位抄袭者，教授还照样做，还照样给学生讲他的学术成果。

我忽然想起前两年的这两起剽窃事件，是因为我在刚刚来到的一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 年 4 期）上，看到李佩珊、薛攀皋两位先生的文章《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揭露了北京某大学生物系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的 6 名研究人员（文章署名潘爱华），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有 1／3 抄袭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报告。这篇文章也是采用对勘比较的方法。文章的作者希望“把这一事件公诸于科学界，对端正学风，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大有稗益”。

这几起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事件，已经催人猛醒，我们今天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的确面临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科学道德的问题。与那些地方大学，小科研单位个别人为评职称而抄袭的行为不同，这几位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本身并不存在职称问题，他们已经是教授，而且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是国家级科研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这样做，败坏的不是自己的名声，而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声誉，所以对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可耻的行为，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言论上对这种行为穷追猛打，让这些抄袭者的名誉扫地。为此，我建议国家教委和有关单位，对这类事件的发生，要给予高度注意，如有大量可信的论证材料证明确系抄袭行为的话，至少要立即取消这些人的高级职称，并公布所涉事件当事人的学术经历和真名实姓。如果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手软，那是中国学界的耻辱。发生此类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不了了之。

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 4 册第 303 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 年 7

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26 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

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 27 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 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

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5 册 1895 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 20 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 年 7 月 9 日，27 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

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

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94 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 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 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 130 页）。

20 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

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 537、541、542 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 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 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 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 281 页）。

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 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金岳霖的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6 册，2293 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 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 28 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

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 127 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

40 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 115 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 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
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
期》，《读书》1998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

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
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
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
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
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
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
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
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
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
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
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有意味的百分比

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 年共有 55 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知道的。1958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 30 万。

后来不久，又说有 40 余万人。1959 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 45 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 552877 人。1980 年共改正了 54 万余人，余下的 5000 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 55 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也认为 :“ 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 55 万余人。”（该书下册 839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 55 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谁订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书，才感到这个 55 万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

毛泽东是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 50 年代初的“ 三反 ”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数字的喜欢。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

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

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

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该书 3 册，89 页）

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出来的。

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十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

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的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

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 页）

在“ 三反 ”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 预算观 ”，就是说运动中应有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 比例观 ”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 1952 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一份批语中就说 :“ 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 ”（151 页）。这个“ 十分之一 ”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 :“ 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2 页）。1955 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 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 ”（同上 23 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

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 55 万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7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 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 1957 年 3 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 500 万知识分子为基数。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有 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了堆”(同上 153 页)。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 500 万左右。这 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 500 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379－380 页)。

按毛泽东的习惯，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 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 50 万左右的右派，这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 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 500 万人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 500 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 380 页)。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 537 页)。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 500 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 500 万的百分之十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 55 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 339 页)。

电视与学术明星

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学者介入电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批评者以为这是学者的堕落，而有幸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以为这是他们介入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明星的称呼，也很不以为然。

现代社会，电视是首选媒体，尤其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差不多可以说是获取信息、娱乐及思想的惟一渠道。按理说，学者选择这样的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并影响大众的观念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人们对学者的表现看不上眼呢？称他们是学术明星，这还是客气的，我在私下里听到的还有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说法。不管这话中听不中听，我们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情绪化的反映，从中来反思一下学者自身的表现吧。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者要不要介入电视，而在于怎样介入电视。如果平心静气地听听人们对学术明星的批评，虽然有过激之处，但就这种情绪所代表的思想倾向来说，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尽管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学者的鄙视性称呼。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学者应该比大众明白，但实际上那些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谈起问题来，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学术明星呢？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护的学术明星，我以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

学者们一般都知道，索尔仁尼琴那篇著名的《不要在谎言中生活》，他在那篇文章中表达的思想和做人态度，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不然我们就糊涂得不可救药了。

学术明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台湾杭之先生在《一苇集》中就有长文分析这种现象，可惜许多学术明星忘记了他的告诫，自觉扮演这种角色。只要有好处在，这种角色也就不会绝迹。杭之就说过：“只要有政治的存在，或至少开放、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还没有健全地建立起来，这种为了政治之需要而制造出来之凡是的、歌德的学术，文化明星便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永远不会消失。”喜欢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但他们要随时耐得住性子听老百姓的批评，你做都做了，难道还不让人家说吗？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

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因为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的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顾准。

《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才能逐步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

1959 年 1 月 9 日，顾准说："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誉，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顾准日记中不仅真实地记下了他所目睹的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

中国农民过着糊口经济的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懂得这个
问题。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未，以强力未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
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 7000 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
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的称号。

若说农民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这个称号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像农村那样"组织集体生活"，城市工人必要引起暴动。

顾准 1959 年写于河南商城的那些日记，可以说是他思考中国农村问题智慧的结晶，顾准敏锐的思维，犀利的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超前了后人二十多年。顾准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敬重，除了他的人格力量以外，与他在理论上的深度是分不开的。40 年前，顾准的思索，今天读来，还让人怦然心动。他说：

从这里， 不仅证明了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也征明了宣
传与教育的力量。
人们硬是歌颂十大建筑，而又以农民的艰苦生活当做献身精神的原动
力。
应该承认，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是今天的时代思潮，我必须充
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人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 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
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
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农本主义极不明确，相反，无论
在中小点的建设目的，都是大会堂式的现代化——拼命的刮削农村来进行

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

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

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只能在指定地点吃愈为严重。

那么，一把卡住农村全村人口吃饭问题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

的权力的来源，与道德败坏的泥坑？

中国又是一种，而中国较之斯大林为尤左。其实原因也简单，因为集

体农庄在苏联已足以解决商品粮食问题，在中国，若不“组织生产又组织

生活”，商品粮并无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人口与土地问题。难道社会主义

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以上这些话是一个知识分子40年前发出的声音，虽然当时不为人所知，但它说明，在那样禁锢的年代里，还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念，使中国当代思想史不再成为空白，仅此，顾准就足以让当代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思考，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思想家的气质，顾准的意义在于他不仅超越了时代文化禁锢和物质贫困的局限，执著地将眼光投向世界，更在于他始终怀有对底层贫民生活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读《顾准日记》的时候，我总想到离开他的日记，去看一看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是怎样感受现实生活的，我想到了《竺可桢日记》。1956 年，顾准曾和竺可桢在科学院综合委员会工作，竺可桢是早顾准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后来好像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思考。我比较了 1959年12月31日竺可桢和顾准同一天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是这样的，当天竺可桢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宴请苏联专家的晚宴。日记这样写到：“膳后已8 点半。院预备了游艺节目，有民族歌舞与独唱，钱学森夫人蒋英也唱了两支曲，与游艺并同时进行跳舞。……直到12点。进至1960年元旦时，郭院长已和陈副总理至人大会堂，由张副院长祝大家新年快乐后，又进行了一小时的跳舞，一点始回。”接下来竺可桢真实地记录了大跃进以后的情况，他说：“酿成阳历年市上买不到蔬菜、肉、蛋的现象。”就在这同一天，顾准当年的朋友和同事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苏联专家晚宴、游艺、跳舞的时候，远在河南商城劳改的顾准在日记中写到：“长竹园的人们，下午三时左右回来，我虽然吃了 10 两午饭，还是随着吃了一顿。……八时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朋友们歌舞欢唱的时候，处在饥饿之中的顾准在想什么呢？请看下面这样的文字：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已为西方学者所传播，苏联的一位作家专门写东西加以驳斥。

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我是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的。

就算是花岗石脑袋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孩子们长大。

继续这个态度，滲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有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的真实的努力方向。

所以要争取经过经济研究所到北大或复大去教书去。

现在弄不清的是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

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

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

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我无意责备顾准受难时那些处境尚好的知识分子，但面对顾准留下的思考，他的形象无疑显得高大。别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而顾准这样的很少很少，因而我们的思想遗产也就不够丰厚，所以今天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格外珍惜顾准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因为这些东西——用顾准的话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

《顾准日记》就是这样用生命写出的，这样的书是永远有生命力的。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

一、教育转型

西南联大建立之时，恰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 10 年之际。联大的建立带有突发性，因为抗战开始，为使中国大学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才有了西南联大的出现。

她与抗战共始终，在昆明前后共计 9 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学术界公认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成功的大学。由于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三所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所以她的成功对于我们评价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很有启发的。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以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而这开端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本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那些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事例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本世纪初叶时，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在交通大学开学时有一个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

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请君修学当以三事为难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附，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然后又说：“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遐庵汇稿》第 345－347 页，1930 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本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西南联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

二、大学独立

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 1925 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 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但只用了 10 年时间，到 1937 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可以从她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很浓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是很清楚的。1941 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先生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林元《碎布集》第 41 页）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样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

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它做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三、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

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联大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联大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东西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旧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旧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314 页）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大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939 年 3 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 年 6 月 10 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南开大学校史》第 260 页）。好在那时的教育部管事的人也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旧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王浩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

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4 辑第 66 页）。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我们再看一件小事。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括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163 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四、校长的合作精神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校长间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二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成大事的一个例证。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也有过猜疑，有过观望。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他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格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蒋梦麟和叶公超他们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的时候，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他们隔几天就向教育部去电催驾，教育部回电很快，总是说他们的电报已经转给张校长了。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就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去一次，甚而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是很见他的性格的，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

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

等几天没有关系”（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笳吹弦诵情弥切》第 20 页）。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先生都到了昆明，联大前后 9 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说是合作成功的。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三个校长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一

闲来无事，读鲁迅、郁达夫日记。鲁迅、郁达夫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二人在现代文学的许多门类中都留下了传世之作，令人肃然起敬。平日读书，多看他们的小说、杂文，与日记是较为疏远的，最近读了，感到还是有话可说。把鲁迅、郁达夫的日记比较着看，可以了解两位作家性格的差异和文风的不同，作为一种文本研究，看日记或许比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见出作家的真性情。

二

鲁迅生于 1881 年，郁达夫生于 1896 年，晚鲁迅 15 年。两人同为浙江人，同为留日学生，又同中途改行从文，而且二人私交甚好。说到早年经历，又有许多相似处。鲁迅少年丧父，郁达夫从小失怙，家道中落，寡母抚孤，在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鲁迅终身难忘为给父亲治病而在当铺前所受的白眼。郁达夫有过母亲为了满足他穿一双皮鞋的愿望，“老了面皮”“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的感受。（《郁达夫文集》第 3 卷第 375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鲁迅由于父亲为中医误治而死，一生对中医都无好感；而郁达夫自“皮鞋”事后，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说：“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经过一番波折，居然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过来。”（《郁达夫文集》第 3 卷第 376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从以上的事情可以看出，鲁迅、郁达夫都是异常敏感的人，这种性格的特质来源于早年的经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家道中落这一条。长久的贫困和长久的富足对人们的性格形成固然都有影响，但由贫到富或由富到贫的逆转常常给人的刺激强烈。由贫到富易产生报复心理，把以往的苦难往富人身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

愈来愈贫穷了。

（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 年第 6 期）

三

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 1912 年到他逝世，25 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账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是两种日记的最大区别。鲁迅记日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

四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 1933 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打牌、抽大烟、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倒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

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 1921 年刊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 1937 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发表的日记就有 20 多万字。

《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 1932 年杭州客居生活，《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记述 1934 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抒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少年无法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倾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晦，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忏悔，不断下决

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

五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价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 154 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 年第 2 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

1919 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
14 卷第 335 页）

1925 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同上，第 548 页）

1926 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同上，第 592 页）

1927 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 651 页）

1931 年“ 九 · 一八事变 ”: 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 894 页)

1935 年“ 一二 · 九运动 ”: 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
小川正夫信并赠《トトイェタ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
册。(见《鲁迅全集》第 15 卷 258 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 空白 ”和“ 失记 ”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内许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 四 · 一二政变 ”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
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
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
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
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
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
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
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
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
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 · 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 ”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 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 ”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 体裁似乎不关重要 ”,“ 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

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西南联大是在抗战中由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为我们分析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

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我们今日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循的标准。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 50 年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即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陈寅恪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学术贡献，都是这种学术精神的体现，舍此，学术必是荒芜的旷野。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学术精神的缩影。

按照常规，战争带给学术的影响是深重的，但中国的学术界在战争中

的经历，却有它相对例外的一面，就是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致命的。何以会出现如此的意外情况呢？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说，要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于学术的热情和执著，是完全以“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中说：“我们不要以为这七年来的抗战，又把中国哲学的进展阻碍了。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

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贺麟《当代中国哲学》附录，第 143 页，1947 年胜利出版公司）谢幼伟举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另外，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主要由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深情地回忆过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马叔平、吴承仕、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肇祖、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钱穆说：“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貌出现。”（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159 页，1983 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钱穆“承认 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的惋惜。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的发展和延续，即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余英时说过，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重庆，而思想和文化重心则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在思想上继续“五四”的传统。那时在属于北大、清华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调还是“民主”与“科学”。

群贤毕至，少长成集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战争爆发以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内，30 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继。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时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教授的阵容（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第 289－313 页，199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学院——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　罗常培　罗　庸　魏建功
杨振声　陈寅恪　刘文典　闻一多
王　力　浦江清　唐　兰　游国恩

外国语文学系：

叶公超　柳无忌　莫泮芹　陈福田
燕卜荪　黄国聪　潘家洵　吴　宓
陈　铨　吴达元　钱钟书　杨业治
傅恩龄　刘泽荣　朱光潜　吴可读
陈　嘉　冯承植　谢文通　李宝堂

林文铮　洪　谦　赵诏熊　闻家驷
陈家民　温　德　黄炯华　胡　毅
历史学系：
刘崇鋐　雷海宗　姚从吾　毛　准
郑天挺　陈寅恪　傅斯年　钱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举　向　达
张荫麟　蔡维藩　葛邦福　吴　晗
哲学心理学系：
汤用彤　冯友兰　金岳霖　沈有鼎
孙国华　周先庚　张荫麟　冯文潜
贺　麟　郑　昕　容肇祖　王维诚
王宪钧　陈　康　敦福堂
熊十力（专任讲师）
法商学院——
政治学系：
张奚若　张纯明　崔书琴　邵循恪
吴之椿　浦薛凤　王赣愚　张佛泉
钱端升　罗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赵凤喈
经济学系：
陈盛孙　赵乃抟　周作仁　秦　瓒
伍启元　周炳琳　李云鹏　张德昌
徐毓丹　杨西孟　载世光　萧　蘧
周覃绂
法律学系：
燕树棠　戴修瓒　蔡枢衡　罗文干
张企泰　李士彤　费　青　芮　沐
马质夫　章　剑
商学系：
丁　信　李卓敏　陈序经　陈公孙
林维英　李云鹏　周覃绂
社会学系：
陈　达　潘光旦　李景汉　李树青
陈序经　吴泽霖　陶云逵　费孝通（讲师）

学术传统的延续，首先要靠相对稳定的教授群体的形成。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出丰硕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个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现象。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 30 年代前完成中西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那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 1900 年前后为代表，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以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 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为代表。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如钱钟书、费孝通等人已经是留

学归来了。这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 50 岁、40 岁、30 岁。这个年龄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它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在西南联大，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对他的才能，陈寅恪也认为钱种书“人才难得”。这种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西南联大时期，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如陈寅恪对周一良、杨联升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堪称学林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由于这个传统成为大家公认的价值标准，在西南联大，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精神上，当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们可以从当时一封简短的信函中，看出当时大学教授的心态。1946 年 1 月 29 日，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半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计开：

一、王瑶论文题《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

二、初试范围：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三、考试人员，除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

这封短简，可见闻一多当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体现。首先，作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对学术有极严格的要求，这也是西南联大的规矩。闻一多的这封公函，是给校长和教务长的，但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对王瑶的初试，完全由闻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报。从闻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与王瑶论文所涉专业有研究的，可见要求之严格。梅贻琦在闻一多的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两个字：“照办琦一·卅。”闻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写的，梅贻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同年 4 月，梅贻琦在朱自清关于王瑶毕业论文考试聘请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备晚饭。”

这是西南联大诸多学术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给我们许多联想，一个时代学术传统的高扬，带给人精神上的决乐是学术发展的基本保证，王瑶后来痛苦地放弃了他喜爱的中古文学，而改治中国现代文学，但他毕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续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40 年代中期后，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曾有担忧，他在日记中写到：“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

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为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当时的西南联大虽是三校联合，但实际负责人是梅贻琦，他的这种信念，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保持了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视的精神遗产。

大学的理念

傅斯年 1945 年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接替离职的蒋梦麟。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曾写过一篇名为《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他在文章一开始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入的工具。”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待下去，他也会继续保护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1946 年西南联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华、南开。她的学术传统也随着教授重归自己原来所在的大学而继续发展，但后来这个学术传统被阻割了。随着 1952 年的院系调整和以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在慢慢地消亡。关于这个学术传统的消亡，我们可以做出许多解释。我想简单通过冯友兰和贺麟的经历来略述一二。

冯友兰在《南渡集》中曾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他是极赞成学术独立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冯友兰做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正是靠他和他的同事们保持和延续的，抗战八年，加上后来的五年时间，他始终保持着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但后来丢失了。贺麟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虽然当年他和冯友兰都曾被蒋介石请去给中央政治学校的干部讲过课，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说过迎合蒋氏的话，但贺麟本人对西南联大的传统还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1941 年他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的这一番话，讲得真好。但后来贺麟也放弃了他的学术尊严，说了许多违心话。一种学术传统，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 1937 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 年 11 月 1 日－1945 年 7 月 31 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 118 人，占学部委员总数 473 人的 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 8 卷第 2 期，第 22 页，北京，1990 年 6 月 19 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 年第 7 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当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 13 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 年 1 月 2 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 年 5 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土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凤、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 21 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 2－3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月）7 月 17 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 月 148，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

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 月 2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 11 期，第 9 页，北京，1882 年 4 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 年 12 月 13 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 月 1 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 年 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

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 515 页，重庆出版社，1992 年 1 月）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 年 1 月 20 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 1945 年 10 月 19 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钟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从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已存在了近 40 年时间，这期间 1904 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 47 人留学生，其中 31 人留日，16 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 23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 10 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

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 1909 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 15 年，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 40 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

南开大学从 1904 年建立中学到 1919 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6 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我们观察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

姓名	生卒年	早年教育背景	留学国家	联大时年龄
蒋梦麟	1886－1964	上海南洋公学	美国	51
梅贻琦	1889－1962	南开学堂	美国	54
张伯苓	1876－1951	北洋水师学堂	考察日本教育	61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是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出生的年代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 15 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梅、蒋留美的教育背景大体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状况，而他们前代的知识分子即梁启超那一代的教育背景则以留学日本为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建立，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大体是同步的。如果没有抗战，这个群体同样存在，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西南联大那样密切合作而已。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个过程太短了，从清华 1909 年首次制度性派赴美国留学生，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是两代知识分子，即十九世末出生的那一代人（以胡适为代表）和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钱钟书为代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于他们生存，这批知识分子中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抗战爆发时，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年长的是在 50 岁左右，更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他们的年龄不过 30 岁。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这意味着它的美国化程度。以 1909－1929 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每一年度的留美学生都有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的，1909 年梅贻琦，1910 年胡适、赵元任，1914 年金岳霖，1915 年袁复礼，1916 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 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 年刘崇鋐、叶企孙，1919 年钱端升，1920 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 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 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 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 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 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 年柳无忌、丁佶，1928 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 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 636－646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4 月）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除初期 1911、1912、1913

三个年度中没人进入西南联大外，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每个年度都有留美的学生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而且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第一流学者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大，见下表：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 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说 1920 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 1945 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 1910 年前后出生的人。

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钟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钟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 1910 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 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 179 位教授中，97 位留美，38 位留欧陆，18 位留英，3 位留日，23 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 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 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 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 年）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 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 年 1 月 10 日 3 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

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1942 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 223 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年 5 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

（同上，第 225 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 12 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 226 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 101 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 1992 年 4 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 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314 页，中华书局，1981 年 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 18 册，第 66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 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

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 1949 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其它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 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 3 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 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徒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 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 300－400 元，最高可达到 500 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 120－200 元，助教为 80－140 元，一般职员 30－100 元，工人 9－25 元。（转引自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 年第 3 期，第 29 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 20 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一多在 1926～1930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 1931 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 11 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

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 11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自由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本特征，只育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一起，1949 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总是能将磨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

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

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做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薰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 310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 8 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第 66 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 15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 12 月）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 1949 年以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精神状态

（略，参见本书第五辑《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一文）

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 1949 年后开始衰落。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问题。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

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 1952 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

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的意识形态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 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

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到：“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第 8 页）正是这位朱光潜，在 1949 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 1951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文学双月刊 1994 年第！期，第 163 页）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了，但在 1980 年以后，朱光潜率先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 379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 1 月），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朱光潜全集》第 2 卷，第 210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年）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逃出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第 4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 156—161 页，三联书店，1984 年 12 月。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 74－75 页，三联书店，1993 年 10 月）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前者的明显用意有否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味，因为陶是留美的学生。而后再将矛头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

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 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吸收入盟，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这样到了 1957 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毛泽东曾说过：“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1995．7．13．太原

《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

四十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都成了《观察》周刊的特约撰稿人。

《观察》是由重庆《客观》周刊而来的。储安平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 6 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1]。 [1]《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 17 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2]。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3]。 [2]《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3]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 1994 年第 2 期第 74 页。

储安平是 1946 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十二期《客观》周刊，从第十三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 13 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十二期。当时他们以为 1946 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十二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十二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4]。

[4]《客观》周刊第 12 期第 2 页。

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

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

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5]。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 [5]《客观》周刊第 1 期第 1 页。

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

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 9 月 1 日出版”[6]。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

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7]。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 [6]《上海文化》第 8 期第 25 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7]《上海文化》第 9 期第 6 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

《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在前十二期中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六期为吴世昌撰写），是了解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言论。

安平的《客观》政论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的众多周刊，充分表明了所有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所以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观察》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以下我着重评述对国共两党的分析，其他各点大体与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相一致。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1]。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2]。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3]。
[1]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2页。

[2]储安平《一团糟的责任问题》,《客观》第1期第2页。

[3]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

首先，储安平对共产党前途的判断是失误了，他认为：“我个人不相信共产党在最近的年月中即得政权，我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4]。虽然在具体前途的判断上储安平失误了，但在《客观》时期，他对共产党所作的理论分析却是相当深刻和极富远见的。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她的长处，但也有的她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5]。 [4]储安平《国民党的病症》,《客观》第2期第1页。

[5]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期第1页。

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他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6]。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7]。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

断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8]。 [6]储安平《共产党与今日中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第2期第1页。

[7]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期第1页。

[8]储安平《共产党的前途》,《客观》第4期第1页。

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他对共产党不仅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而且指出他在自己统治区域的现实。据此，他质问道："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9]"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10]。 [9]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10]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储安平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11]。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他过分早熟的对自由与民主观念的理想，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大学教授这个范围内储安平的言论行事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

多的人时，他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11]储安平《中产阶级及自由分子》，《客观》第 12 期第 1 页。

《观察》始末

一、《观察》诞生的历史背景

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注意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代”来划分，从康有为、梁启超算起，中经毛泽东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1]。

这种思路对于清晰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这种以“代”划分的方法有失于笼统。因为在每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追求目标。比如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如果单从活动和生活的时间概念上着眼，我们会把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来对待，但如果细察，我们会发现，在这同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他们中的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间所信奉的思想来源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观察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时候，必须以他们当时所信奉的某种思想和追求目标来判断他们所处的具体位置，否则对于整个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可能会离他们的实际思想不相吻合。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 470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中，有两种思想特别值得注意。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主义思潮，他们一般都主张革命，非常推崇苏联的革命实践。另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地倾向于走欧美国家的道路。从这两种思想文化潮流主要代表人物的留学背景考察，主张革命者以留日的为多，主张改良的以留欧美的为多[2]。这一背景极富启发意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与留学生制度的设立有很紧密的联系，在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对传教士和留学生所带来的影响给予特别注意。如果我们把留学背景和每一种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大体上发现留学背景在这种思潮代表性人物身上的集中体现。在留日和留欧美的问题上，从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经济状况上分析，留日的人数要相对多于留欧美，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且有语言上的联系[3]。而留欧美的一般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富家子弟，所以留日的学生天然地带有低层贫民的倾向，而留欧美的学生则带有中产阶级的特征。从留学生的数量上看，留日的学生要比留欧美的多[4]。　　　　[2]拙文《试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特点及留学情况》，山西《晋阳学刊》1991 年第 3 期。

[3]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 46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 4 月影印本。

[4]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第 46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 4 月影印本。

留学生制度的形成，自然也带来了学生归国之后社团形成的基本倾向。以留学国家为基本标准，无论是社团还是刊物，大体是以留学的同学为基本范围的。

从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看，我把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我主要留意现代，所以不从严复算），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作为他们活动和言论的基本范围。我对这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是：虽然在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中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和见到他们的活动，但由于他们所主张和追求的目标是以人类的基本价值（自由、理性、公平）为最终目标的，是一种长期行为，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都很难完全接纳这种东西，但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局限，作为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尽了他们的天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他们当年所主张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价值，而且恰恰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在严密的禁锢下，成为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来源。在二十世纪的末叶，当曾经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夺取了政权的某种思想力量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目标。《观察》的诞生可以视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最大努力。虽然它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抗争了不到 3 年时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长远的，它的精神可以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恰恰又正是中国各个学科中的创始人或最有创见的学者，虽然 1957 年和 1966 年埋葬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他们的知识分子品格仍在影响着他们的弟子和门徒，绝不仅是在事业、知识上，而是整个精神品格上。无论是《观察》创办者，还是聚集在《观察》周围的人们，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视为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储安平在 1946 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 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少，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稳固…… "[5]。在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胡适、傅斯年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既有稳固的专业范围，又格外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参预过政治活动，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胡适的情况已有很多研究者给以评说，傅斯年当年敢于冒死向蒋介石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也完全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5]《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 168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版。

二、《观察》的诞生经过

《观察》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刊。《观察》为周刊，16 开本，每期 6 万字。由于《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是迄今为止极少的几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所以中国目前关于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极少，除了 1957 年在批判储安平时，常涉及到《观察》之外，对于《观察》的研究是很不完备的。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除了戴晴在 1988 年写过一篇《储安平和党天

下》的报告文学，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对《观察》的评价外，再就是从《观察》到《新观察》的元老林元在 1987 年初写下了《从〈观察〉到〈新观察〉》一文，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观察》的历程。1945 年，储安平和他曾在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著名报人张稚琴在四川重庆办了一个名为《客观》的杂志。这是一个八开的周刊，16 页，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每期约可以发 6 万余字的文章。曾与储安平一齐共过事的报人冯英子说："《客观》实际是《观察》前身，因为它的重点在于评论" [6]。林元则认为："1945 年 11 月，储安平先在重庆办过一个《客观》周刊，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客观》其实是《观察》的前身。后来，储安平先生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 [7]。这种认为《客观》是《观察》前身的说法实际上来源于储安平。储安平在谈到《观察》的诞生经过时曾说过："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8]。因为《客观》从刊名上过渡到《观察》，即可看出一点二者的渊源关系。况且两个刊物又都是由储安平主编的。　　[6]冯英子《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见《编辑记者 100 人》第 41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7]林元《碎布集》第 395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8]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9]：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

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

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

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

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

贯彻我们的精神。[9]　　[9]储安平《辛勤·忍耐·向前》，《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 页。

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

1946 年 1 月 6 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

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的消失，是近 50 年来中国文化界缺少活力的根本原因，言论的阻塞，舆论的一律，使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虽然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1957 年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试图夺回这种天然的神圣权力，但他们都以悲惨的结局结束了自己抗争的生涯，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根本剥夺，使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向大众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法向腐败政治制度提出抗议和建设性的意见，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使一切腐败的行为失去了一种有效的制约，社会正义良知我不到传播的媒介。对新闻和舆论的绝对控制在长时间内消磨着多数人的意志，甚至有可能使多数勇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变得沉默起来。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 105000 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10]。

[10]1985 年《新观察》35 周年纪念册，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 397 页。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

在 1946 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的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

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 78 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

在研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每一个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 5 卷中，每到出满 24 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 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现照录如下[11]：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 168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版。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

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

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 先生，赐予支持；

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

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

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

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

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

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

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

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

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

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

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

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

稿费，
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
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
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
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
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
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
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
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
人。
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
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志私从公，献身于一
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
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
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
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
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
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
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
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
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
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
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进进先
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

月十

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

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三、《观察》的停刊

《观察》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刊后，至 1947 年 2 月 8 日出满第 24 期，是为第一卷。

1947 年 3 月 1 日出版第二卷，至 1947 年 8 月 9 日出满第 24 期，是为第二卷。1947 年 8 月 30 日出版第 3 卷，至 1948 年 2 月 7 日出满 24 期，是为第 3 卷。1948 年 2 月 28 日至 1948 年 8 月 7 日出满 24 期，是为第 4 卷（第 23、24 为合刊）。1948 年 8 月 28 日至 1948 年 12 月 25 日出满第 18 期停刊，所以《观察》第 5 卷只出了 18 期。为什么《观察》出到第 18 期后无法再出版了呢？因为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

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第三卷第 9 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平安的寓所。1948 年 7 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 7 月 17 日出版的《观察》第 4 卷第 20 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文章如下[12]： [12]《观察》第 4 卷第 20 期第 3－4 页。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

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

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

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今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

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

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

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个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

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

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

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

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
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
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
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
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
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
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份子，献策
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已之献，合而言之，充实
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
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
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
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
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
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
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
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
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
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於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
之，未免昧於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公消减，
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
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
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
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

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讦，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现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於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於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做所为，对於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於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

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设建
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
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
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
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
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
一一见之於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
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
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会采
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
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
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些不利
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
之困难而言，因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
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
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於报纸杂志
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於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
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
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
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於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
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
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

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
大错特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
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
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
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
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
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
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
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
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
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
迫害，备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
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 5 个月以后，1948 年 12 月 24 日，《观察》才遭不幸。

从 12 月 21 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 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13]：

[13]林元《碎布集》第 401－402 页。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
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
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
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
原领登记征送部注销。

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

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 1948 年 10 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 年作为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14]。 [14]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上海《上海滩》月刊 1992 年第 7 期第 42－46 页。

四、《观察》的复刊和终止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 1949 年 5 月 23 日上海解放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 年 5 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 1949 年 11 月 1 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 1950 年 5 月 16 日的第 14 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 6 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门北吉祥胡同。

《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五、《观察》的消失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 3 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持的是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无党无派，走的是中间路线。在《观察》时期，它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为当局所不容，由于共产党当时正在崛起，与衰落的国民党相比还能给人一点朝气，但在《观察》时期，储安平对共产党一直保持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著名的《中国的政局》和《评蒲立特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等文中一直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养大的，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它失去了信心，政府腐败和无能加强了左派的力量。

《观察》的言论以揭露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但必须指出，这种对共产党的同情并非来自于对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

支持，不是的。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国民党明令查封《观察》，他敢于抗议；共产党让《观察》复刊，难道他就能那样很诚服地把思想转变过来？要知道 1948 年 12 月查封《观察》到 1949 年 11 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他当年所说的国民党执政自由是多的问题，而共产党掌权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将要成为现实了。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当年在重庆办《客观》都不愿受人管制的储安平，在一个很快变成舆论一律的环境中他还能有什么举动呢？也许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言论管制的松懈使共产党警觉，所以 1949 年以后一切有关新闻、出版和传播的观念全都改变了，绝对不许私人染指新闻和出版业，这是一个意识到新闻自由威慑力的政府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对自己政治能力的绝对不自信和对人民大众的绝对不信任。

1949 年后中国部分文献中出现的储安平与《观察》

1949 年后，曾经影响甚大的《观察》开始被人遗忘，尽管由它而来的《新观察》还存在，并且在当时中国同类型的刊物中它还是比较能说真话也受到读者欢迎的，而且它一直保持了它的半月刊形式，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以半月刊形式存在的刊物已不多见。

《观察》的被遗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对这个刊物的态度，或者说反映了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八年抗战，五年内战，被战争的硝烟搞得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渴望安定，渴望和平，渴望能在平静的日子里建设国家，强大民族。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深深地伤害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他们开始向“左”看，他们无论在理智上对共产党作怎样的评价，但在情感上，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多少把新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新执政党身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由于过分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在共产党崛起的时刻，放松了对这个执政者本质的认识，也许是轻信吧，他们以复杂的心情回到新政权的怀抱中。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1949 年以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莫过于言论自由的废止，他们在国民

党时期曾经享受过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权利，虽然不断遭到粗暴的干涉、查封，但毕竟没有完全把言论的渠道堵塞。但 1949 年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接踵而来的肃反运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使多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这一切大概与他们曾经怀抱的理想大相径庭。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胡风本是一个左倾的共产党人，但未经本人同意，公开刊布个人的私人信件已属不可理解，更进而以此定罪，怎么能不激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感呢？1957 年，虽然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未识破共产党的“阳谋”的情况下讲了真话而惨遭不幸，但也必须看到，在 1949 年以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民主，要求同人出版社，要求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他们不曾想到共产党会把事情搞成后来那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即使有所过失，想必共产党也能够理解，国民党时期以言论政，他们至多也只能把你的嘴堵上，总不至将人身的所有权利都剥夺吧？然而，他们想得天真了，后来的结果，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何以遭受如此灭顶之灾，但这一切恰恰发生了，差不多 20 年后，他们才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有很多人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右”的罪恶不在于它具体地迫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也足以构成其千古之冤），而在于摧残了“士气”，摧残了知识分子勇敢地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勇气。“反右”的结果使中国整个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以沉默来抗争的方式，而放弃了主动出击，大胆批评政府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不否认整个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败类，是他们紧跟权贵，落井下石，使大批正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靠武装斗争和严密组织起家的政党，对于民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心理根源在于对自己所施行的一切的绝对不自信，对民主的恐惧是贪权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像《观察》这样曾经宣传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的刊物，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

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对曾经存在过的报刊在专业之外享有广泛声誉的大概就算是《新青年》了，其余的文化刊物基本已不再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自由的学术领域也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学术研究中选择的自由随之丧失，我们看不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除了大批判，就是对自己往日事业的肉麻吹捧，这是《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的时代。

《观察》被人不断提起，不断引证的时候，是 1957 年夏天储安平放言“党天下”之后，为了寻找储安平反党的历史根源以证明他一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以便从中发现储安平的劣迹。在 1957 年的夏天中，对《观察》的详细评论大概要算《光明日报》的前主编常芝青了。他曾写过《“从联合政府”驳储安平》[1]。《从储安平——〈观察〉看民主的个人主义新闻观点》两篇长文，对《观察》做了完全否定性评价，属于大批判式的。1957 年以后，《观察》基本完全被遗忘。1978 年以后，各种综合专业性辞书中一般也不收《观察》这个条目，即令收入，也多数做了否定性的评价，至多是在否定之后多少肯定它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为了给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思路，我从几本常用的辞书中抄出有关《观察》的条目，并略加评述：　　　　[1]分别见 1957 年 8 月 16 日《光明日报》头版和 1957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创刊号《新闻战线》第 9-29 页。

1983 年出版的《简明新闻学词典》这样介绍《观察》[2]： [2] 余家宏等编写《简明新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刊物。宣传“民主个人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对国民党内战政策也有所批评。储安平主编。1946 年 9 月 1 日创刊于上海，1948 年 12 月 24 日停刊。其前身为《客观》，1945 年 11 月——1946 年 4 月在重庆出版。

《中国革命史辞典》这样评价《观察》[3]： [3] 马洪武等主编《中国革命史辞典》，档案出版社 1988 年 3 月。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刊物，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刊，周刊，主编储安平。前身为《客观》杂志，该刊标榜坚持“不偏不倚”的政治路线，经常登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的言论通讯，要求“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但也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该刊对国民党统治地区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同情态度，但又认为青年学生容易“偏狭冲动”。

1948 年 12 月 24 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中华民国史辞典》对《观察》的介绍稍为详细[4]： [4] 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 9 月。进入 90 年代以后，有关中华民国史的辞书中对储安平和《观察》的评价有所改变，基本持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只引事实，不加评价，如陈旭麓、李华兴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 1 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前身为 1945 年 11 月在重庆出版之四开本《客观》周刊。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改名，由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社发行。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刊物自诩，主张本“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放言论事。内客有专论、特稿连载、科学丛谈、观察通讯、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书评、出版、转载等。撰稿者有王芸生、伍启元、蔡维藩、冯友兰、张东荪、卞之琳、潘光旦、张印堂等。1948 年 12 月 25 日出第 5 卷第 18 期后被迫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复刊，至 1950 年 5 月出第 6 卷第 14 期后终刊。

《民国史大辞典》以两个条目介绍了《观察周刊》和《观察》：

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出版。储安
平任主编。其前身是《客观》杂志。此刊的作者主要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的知识分子。《观察》周刊创刊时宣称他们“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
思想分于”,“背后别无组织”,“无党无派”，是个“发表政论”而不
从事政治活动的刊物。该刊物经常刊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言论通讯。
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刊登对共产党与解放
区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报道。《观察》周刊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对美蒋
的学生运动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同情态度，但又认为青年学生容易“偏狭冲
动”。该刊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起到了一定的
影响。

另一条解释为：

抗战胜利初期出现的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刊物。
周刊。1946 年 9 月 1 日创办于上海。主编为储安平。主要撰稿人大多是资产
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该刊在刊登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同时，亦对
共产党及解放区作了一些片面甚至歪曲的报道：在对国统区学生反蒋的爱
国民主运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称学生易“偏狭冲动”等。该刊自称大体
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不属任何党派。1948 年 12 月 24 日被国民党政府
查封。

引述资料是繁琐的，而且我知道我所能见到的资料也极其有限，但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的这个思路。因为 1949 年以后，中共对待历史的方法是这样两种：一、从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出发，对于自己不利的东西进行批判，二、对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视而不见。

《观察》在 1949 年以后的命运即是如此，对它的批判远比对它的遗忘要持续的长久，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许多曾经存在的事物在寂寞中被封闭起来。通过以上所引述的 1949 年以后中国文献中出现过的《观察》，人们可以从中思考这个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刊物，在 1949 年以后被遗忘的大致情景。《观察》和储安平被人重新提起和能够给予正确评价是 1985 年以后的事。最初是出现在几位往日朋友的日记和年谱中。

储安平在青年时期，喜欢文学，所写多为散文、小说和对外国文学的

介绍性文字。

《鲁迅日记》1929 年 6 月 21 日记有 :“ 寄安平信并稿 ”。这个安平即储安平。安平作为笔名,《观察》时期也用过,但极少。《鲁迅全集》日记注释有关于储的简略介绍,说储是 “《奔流》、《北新》的投稿者 ”。鲁迅当时在上海主编《奔流》,储曾投过稿,所以有此记载。储后来未在《奔流》上发表过文章。《北新》发过 3 篇。最早的即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为一篇介绍性的评论。文章末尾署写作日期为 “ 二八之春,某日下午 ”。这期《北新》是 1928 年 5 月 16 日出的,储尚不足 20 岁。

1936 年,储安平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

他在书前的自序中说 :“ 最后,我得感谢家璧,这一个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赖他殷勤的鼓励和督促。” 当时储不到 30 岁。

赵家璧是储在上海光华附中和大学的同班同学。赵在 1988 年 2 期《新文学史料》上写有《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其中引述了他 1935 年北上组稿的日记,在 5 月 29 日至 31 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途经南京时和老同学储安平见面的详细情况,他们还一起去看望了当时在南京的小说家张天翼。特别引入注意的是赵对储的评价,虽然不便多言,但简短的注解中能见出他对储的怀念,他毫无顾忌地说了他与储的关系,并说储 “ 反右斗争开始,被错划为右派。据说 ‘ 文革 ’ 期间已逝世 ”。赵的评价是很有力的,因为知情人都知道,储实际上是少数几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据说 ” 二字,可见两位老友已失去联系,读来令人叹息。

1988 年 3 期《新文学史料》连载叶圣陶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在 1948 年 9 月 22 日的日记中载有关于储安平的情况。当时吴晗从北平来沪,几个朋友相聚。“ 傍晚,至观察社,应储安平之招。” 吴晗和叶圣陶虽然没有列在当时《观察》的 “ 特约撰稿人 ” 中,但与储的交情不错。吴晗曾多次给《观察》写稿,还在《观察》丛书中出版了《皇权与神权》一书(与费孝通共同署名,收入他的 5 篇文章)。叶圣陶没有在《观察》上写过文章,但他对储安平和《观察》的评价很高。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到 :“ 储安平请客单上印有三事,别开生面 :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方将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

《观察》销售数至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周刊矣。” 叶至《观察》社时,已是它的尾声,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观察》停刊前发行量已超过 10 万份,可见是有读者的。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中记载 :“ 到上海将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人,经常到星期六晚上、轮流充当东道主,每次约在跟上次不同的地点,秘密聚餐,相互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艺术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秘密聚餐的,有《中学生》编辑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编辑冯宾符,《观察》编辑储安平,《文艺复兴》编辑郑振铎、李健吾等。”

在储安平生前的众多好友中,对他一生不幸遭遇表示过怀念和给予正确评价的是冯英子和徐铸成。他们在 80 年代初期分别写了《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储安平采访三条件》及《我的同乡》[5]。1985 年以后,

随着钱钟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普及，在有关钱钟书的研究资料中，也常有人提到钱钟书的朋友储安平及钱钟书当年为《观察》写的随笔，但令人遗憾的是钱钟书获得巨大声誉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他为储安平这位曾在兰田师院一起共事的朋友写出一点怀念文字[6]。　　　　[5]见冯英子《报海忆旧》第53页，山西书海出版社1991年3月，徐铸成《风雨故人》第8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冯英子1993年还写了《不要回避》一文，对储安平的被遗忘表示不理解，见1993年11月30日《上海盟讯》第4版。

[6]见爱默《钱钟书传稿》第173－17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钱钟书研究》第3辑第20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5月。

应当说在1957年以后，首先从正面对储安平和《观察》杂志给予高度评价的是戴晴的报告文学《储安平与“党天下”》。戴晴作为一名记者，访问了储安平生前的一些朋友，为研究者保存了一些资料，但戴晴的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所以在引证资料和一些叙述上有差错，但我们如果要讲储安平和《观察》研究，不应当忘记戴晴最初的努力[7]。

在戴晴之前，钟叔河先生1986年为岳麓书社主编《风凰丛书》，将储安平的两本专著《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合为一集出版。钟叔河在“出版说明”中说：“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五十年代又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8]。出语平淡，却意味深长。　　　　[7]戴晴《储安平王实昧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此前对储安平给予公正评价的还有千家驹《千古奇冤的“章罗联盟”》见台湾《传记文学》第65卷第56页。《宋庆龄女士的“肺腑之言——1980年7月28日致中共中央建议信》，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第61页。

[8]《英国采风录》“出版说明”，岳麓书社1986年9月第1版。此前，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中，收入了储安平《中国的政局》及为《客观》周刊中“客观一周”所写的几则短论，这是49年以后相对集中收录储安平文章的资料。

学者张啸虎1944年夏天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1948年他四年级时，被储安平邀请到《观察》杂志社工作，当时储安平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张啸虎曾写过一篇《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的文章，他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9]。张啸虎这篇回忆文字对储安平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倾向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9]见《读书》1986第11期149页，还可参阅王火《学者张啸虎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四川《读书人报》1993年6月2g日第4版。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发现和重视储安平与《观察》在自由主义思潮中所起的作用。

汪荣祖在《自由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认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为鲜明，

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10]。许纪霖在一部研究张君劢和黄炎培的专著中即留意过储安平的言论[11]，在论述 1945 年至 1949 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情况时，他说：“最具权威性的要数 1946 年 9 月创刊的《观察》周刊。这份由储安平主编，标明‘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八字宗旨的时评刊物云集了一批最著名自由主义作者，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笔调吸引了全国大量知识分子读者，……左右着舆论界自由主义运动的风向”[12]。沈卫威在研究胡适在《新月》时期所进行的人权与约法论争时说：“同时还吸收一个青年作者储安平——他虽不谈政治，且多是写作文艺作品，但《新月》的精神贯注了他，为他 15 年后创办《观察》，打下了精神基础”[13]。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对储安平一生的信仰有如下评价：“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当别人在引蛇出洞时，他却自投罗网，竟以身殉，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14]　　　[10]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第 2 期第 35、36 页，1990 年 12 月出版。

[11]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 286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 6 月第 1 版，另外，还可参阅孙琴安、李时贞《毛泽东与名人》下卷第 87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2 月版。本书虽多是资料性的，也有不确之处，但也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储安平的下落，本书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几种传闻。

[12]《二十一世纪》第 6 期第 40 页，1991 年 8 月出版。

[13]沈卫威《论胡适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见《民国档案》1994 年第 1 期第 97 页。

[14]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见山西《黄河》杂志 1994 年第 2 期第 76 页。

1949 年后，储安平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报人或政治人物为人所知的，至于他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写作基本上被忽视了。姜德明曾著文介绍过储安平在 30 年代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即他主编《文学时代》的情况[15]。后来人们在论述“新月派”的散文成就时，对储安平的散文多数能予以关注[16]。叶永烈在一篇记述罗隆基的纪实文学中也对储安平在《新月》时期的文学创作给予评价，他认为储安平这时写了不少“文笔优美的小说、散文”[17]。1994 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刊载了储安平的一组散文和陈子善的介绍文字，是近年来对储安平文学生涯的一次重要评价[18]。[15]姜德明《储安平编（文学时代）》，《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第 203 页。

[16]可参阅王孙选编《新月散文十八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出版，张放、陈红编《朋友心中的徐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7 月，朱寿桐《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1994 年第 1 期《文学评论》。

[17]叶永烈《沉重的 1957 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8]1994 年 6 月 4 日《文汇读书周报》第 10 版。

从以上所引述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储安平及《观察》1949

年以后的命运，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学术研究风气的转变，关于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已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至少多数人已感觉到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储安平与《观察》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观察》与《现代评论》、《新月》之关系

从严格的历史事实上看，《现代评论》和《新月》与《观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因为《现代评论》和《新月》既没有与《观察》有任何承传关系，它的编者也不是同一个人，但如果我们不计较具体的历史承传关系，而从整个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以及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考虑，那么我们就会看出《观察》与两个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鉴了前两个刊物并有所创新的。《现代评论》和《新月》诞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观察》出现在 40 年代中期，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 20 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上的差别是令人深思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中，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期间来自革命的“左派”力量不断强大不断给自由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的打击，但信奉这种理想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力量在《观察》时期曾非常活跃，聚集在《观察》周围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和不同理解，构成了本世纪 4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场主要论争，尽管这场论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为了详细考察《观察》与《现代评论》及《新月》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两个刊物的大致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现代评论》是一个周刊，综合性刊物。1924 年 12 月 13 日在北京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 1928 年 12 月 29 日终刊，一共出版 209 期，另外有三期增刊。第 1 进 138 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 开本。

《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

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

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地位。

《新月》文艺月刊，新月社主办，1928 年 3 月 10 日创刊于上海，为十八厘米见方的异型本。1933 年 6 月 1 日出版第四期第七期后终刊，共出版

四十三期。该刊的编者、发行者经常变动：创刊号至二卷一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编辑，二卷二至五期由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编辑，二卷六七期合刊号至三卷一期由梁实秋编辑，三卷二期至四卷一期由罗隆基编辑，四卷二期、三期由叶公超编辑，四卷至七朗由叶公超、潘光旦、梁实秋、邵洵美、余上沅、罗隆基编辑；创刊号至四卷一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四卷二期至终刊号由北平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从第三卷开始就不能按期出版，三卷和四卷一期均不署出版时间，四卷二期到终刊，虽又注明出版时间，但与实际发刊时间常不一致。

《新月》月刊发表有关社会政治问题和哲学、史学、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性论文，但绝大多数篇幅是刊登文艺作品和评论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其所刊创作以新诗成就较为突出，形成了以讲究格律、追求意境、注重技巧为特点的“新月诗派”，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陈梦家是主要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沈从文的小说，陈楚雄的剧本，也较有特色。

《新月》月刊撰稿者多达 170 人左右，不全属新月派，政治与文学倾向也不尽一致；在新月派作家中，政治与文学倾向也不尽相同。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除了两个刊物的性质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两个刊物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

1969 年 8 月 19 日，《现代评论》作家陈西滢在给董保中的一封信中曾详细谈论过他所经历的《现代评论》和《新月》时期的一些情况，在谈到《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时，陈说：“所以你说《现代评论》是《新月》的前身，话虽说的有点道理，因他们都是自命的自由主义者，但门户不同，不容易合起来”[1]。陈西滢的评价有两个意思，第一，从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看，《现代评论》的确可以视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离开这个整体的文化精神，则《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也有不同。我的理解是，对于《现代评论》和《新月》的关系，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自然容易看到不同之处，但后来的研究者由于缺乏设身处地的感受，他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的地方。把《现代评论》《新月》和《观察》联系起来的思路，也是从他们所持的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着眼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愿意说《观察》是完全继承了《现代评论》和《新月》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从三个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风格上，把三个刊物联系在一起，是的确能感到他们之间相似之处的，而且《观察》更接近于《现代评论》。储安平曾留学英国，在《新月》第 3 卷上曾发表过几篇散文，徐志摩遇难后，还在《新月》上发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处叙述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储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适的影响较深，在文学上受徐志摩影响，所以由他主编的《观察》，虽然是一个政论刊物，但储安平毕竟是由文学起家的人，对于文学有割不断的情份，在《观察》每期 6 万字的篇幅中，特意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栏目，每期都发一点这方面的文章。不管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刊物在技术风格上有多少相似的地方，这都不重要，1949 年以前的刊物，多数有这类风格，而最本质的是在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这三个刊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进一步说明三个刊物的相同一面，我把这三个刊物的创刊宗旨做一详细比较，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1] 陈西滢《关于“新月社”》，台湾《传记文学》第

18 卷第 4 期第 24 页。

1924 年，《现代评论》创刊的时候，没有发表专门阐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发表了一则《本刊启事》[2]：　　[2]《现代评论》创刊号第 2 页。

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

本刊内容，包函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

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

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

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现代评论》的这则简短启事，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虽然这则启事未能详细论及刊物的整个倾向，但从“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等语中，都能让读者感到某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自由平等理性精神。

1928 年，《新月》创刊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显然是出自徐志摩手笔的《“新月”的态度》。这篇类似于“本刊宗旨”的文章写得充满激情，它集中体现了该刊同人的胸怀，它宣称：“新月刊是独立的”。它强调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艺与学术上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之外，没有什么一致。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极富浪漫气质的诗一样的语言，但在这浪漫的激情下，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则，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在这头骠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们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间”[3]。　　[3] 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第 19 集第 66－67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如果说《新月》在她的初期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那么到了第二卷开始，《新月》几乎又回到了当年《现代评论》的路子上去了。而《观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一直把政治放在第一，文艺倒退居第二了。这种变化并非出于技术的原因，而是时局的变化使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忍无可忍了。

1930 年 1 月 10 日出版的《新月》第 2 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月〉敬告读者》一文，可以看作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都无什么大变化。我们不妨引证几段[4]：　　[4]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第 19 集第 66－67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 2 卷第 2 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

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

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

后还要继续的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略为
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
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
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
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
欢稳健的合手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时局
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
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
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
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
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
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
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
读者无意的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
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
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
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
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
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
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有那种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
作是批评的工作。

从储安平《悼志摩先生》一文中，我们了解到储安平在 20 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储安平对《新月》是了解的，特别是对于《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他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

评论》的路子。他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5]：　　[5]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
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
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
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
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
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 ”,
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
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
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
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
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 本刊传统 ”: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
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
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通过以上所引有关《现代评论》、《新月》与《观察》在办刊态度上的资料，我们大概会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连年波动的社会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观察》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的言论阵地，在对自由精神的鼓吹和培植上比《现代评论》、《新月》走的还要远，在保障人权、反抗专制，启蒙青年等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 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的争论

1947 年初，储安平在《观察》出满 24 期以后，曾给胡适写信约稿，并把他创办《观察》的目的告诉了胡适。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是希望

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后来《观察》的发展和一贯风格，确实也保持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它在 1947－1948 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严格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可以看做在国共两党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一切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

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 40 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深远的历史眼光。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即令偶有提及，多数也以单一的党派立场，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1]。 [1]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卷第 370－372 页。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七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2]。萧公权在这篇阐释民主概念和历史的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3]，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话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似乎没有统一的称呼，至于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则各有侧重。 [2]《观察》第 2 卷第 7 期第 3 页。

[3]《观察》第 1 卷第 13 期第 9 页。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 1947 年第 2 卷第 2 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她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他，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4]。 [4]《观察》第 2 卷第 12 期第 23 页。

《观察》在 1947－1948 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两党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

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5]。马歇尔作为西方的政治家在国共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公正的，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从理想的意义上看，这是具有远见的。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看，马歇尔在中国的失败，可以看做是两种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　　　　[5]天津《大公报》1947 年 1 月 9 日第 3 版。

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便在《观察》上发表了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战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在其文章中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璃，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调停而言的。杨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群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6]。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7]。

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对国共两党的分析评价完全一致。对于自由主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

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时候，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系。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

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8]。自由主义可能是件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杨人楩的忠告，在近半个世纪后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6]《观察》第 2 卷第 11 期第 3－6 页。

[7]《观察》第 2 卷第 11 期第 3－6 页。

[8]《观察》第 2 卷第 11 期第 3－6 页。

杨人楩在《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一文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这是他在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另给储安平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特别是在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杨人楩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而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其进行批评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9]。[9]《观察》第 3 卷第 10 期第 11－12 页。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以回应。

李文基本上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所言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文在历数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0]。李孝友认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并指出，历史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二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

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11]。 [10]《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11]《观察》第3卷第19期第7—9页。

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在对共产党的评价上，杨人楩更深刻而有远见，在和平到来之后，中共并没像李孝友认为的那样，有容纳异己的雅量，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动，被杨人楩说中了。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12]。 [12]《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批评杨人楩及其关于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已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施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13]，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13]《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14]。 [14]《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刀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

施复亮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15]。 [15]《观察》第3卷第22期第3—5页。

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

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16]。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16]《观察》第 3 卷第 22 期第 3—5 页。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在这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朱光潜这篇文章是有份量的。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

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底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17]。 [17]《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第 20 页。

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因而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18]。

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18]《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第 20 页。

朱光潜对于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底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关口重考虑一番"[19]。[19]《观察》第 3 卷第 19 期第 20 页。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在杨人楩的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论《读〈自由主义宣言〉》[20]，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一文，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说了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后张又在一则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表示不同意见的信。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所以就不多

介绍了[21]。　　　　　　[20]《观察》第 4 卷第 3 期第 3－6 页。

[21]《观察》第 4 卷第 6 期第 5－6 页，张东荪来函《观察》第 4 卷第 8 期第 2 页。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他的观念也是独特的，首先张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 40 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这可能与张东荪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关。在文章中，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并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22]。"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23]。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

我认为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或许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24]。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张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25]。　　　　　[22]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23]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24]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25]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见《观察》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能敏感地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上来，确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在文化上的自由一面，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历史证明，计划的社会除了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以外，实在不可能使自由的精神得以存在。

1948 年 10 月，杨人楩又发表了《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反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杨人楩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

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像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与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26]。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者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许超然，杨人楩则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作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自由主义本身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张票更有价值。

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27]。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终极价值和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及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懂得在当时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28]。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坚定不移地按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事。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29]。　　　　[26][27][28][29]《观察》第 5 卷第 8 期第 3—5 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还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价值，虽然在这场讨论后不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很快即为新的执政者所扼杀了，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却依

然保留了独立的价值。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张东荪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30]。 [30]《观察》第 4 卷第 14 期第 19 页。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具体到当时的现实是张东荪察觉到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解今天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31]。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

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32]。张东荪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

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33]。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他作为知识分子，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别，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31][32][33]《观察》第 4 卷第 14 期第 19 页。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半个多世纪后，我们重新回顾这场讨论，简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作了他们所能作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甚理想，但其精神却感人而伟大。

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

1947 年下半年，以《观察》为主要阵地，曾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直接和间接卷入这场论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很多，其中尤以梁漱溟、张东荪、樊弘为主，另外，费孝通、谷春帆、郭叔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但以往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都对这场论战作了否定性的评价，我认为这是很不公正的。

为什么会对这场以知识分子发起的论战作否定性的评价呢？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从 1949 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对于《观察》时期所开展的这场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争论，我持如下态度：首先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历史条件下，以宽容和理解的胸怀去对待每一个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声；其次，我们应当想到他们毕竟不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热情，以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地讲述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虽然后来很快发生的历史剧变没有能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进行，但这绝不能成为他们的历史错误，书生论政，要紧的是讲出自己的良心话，而不是以投机的心理，审时度势，违心地迎合势力强大的一党一派，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我重新从尘封的历史中去捡读他们当时所发出的那些议论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们是那样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希望她强大，希望她能健康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己见，时时处处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然的对国家对社会所抱有的巨大责任，如果我们不计较某一具体理论在短暂历史中的偶然得失，那么我要说，他们当时的议论是极富远见的，从人类发展的长时期上考察，最终有生命力和讲出真理的是他们。另外，对于这场争论，虽然它是在中华民族关键的历史时刻，一批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具体评价，但我们在评价这场争论时不能完全把它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来看待，因为这场讨论是自发的，每一个参与争论的知识分子只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而无什么党派的政见，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把这场争论看作是一场自由的学术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梁漱溟一篇文章引起的。

1949 年 7 月，梁漱溟在《观察》第 3 卷第 4、5 期连续发表了《预告选灾，追论宪政》的长篇文章。

梁漱溟的文章首先触及了辛亥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宪政。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久存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块心病，从

当时历史情况看，作为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宪政是一个好东西，但好东西是一回事，好东西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则又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讲梁漱溟也认为宪政是好，但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长时间。一般说来，凡是留学欧美；详细研究过欧美宪政理论的人倾向于宪政可行，而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乡村政治结构有较深了解的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实行持怀疑和抵制态度。概括地说，倾向于宪政可行的知识分子多从长远的文化发展着眼，而不计较宪政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反对实施宪政的知识分子，一般比较注重当时的现实，过分看重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我以为主张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是理想主义者，而反对者，多为现实主义者。从长远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看，理想主义者是值得敬重的，从当时的具体国情看，反对实行宪政的知识分子又应得到理解。

梁漱溟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争论，也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宪政问题比较关心，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力陈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及《乡村理论建设》中多次阐述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1]。接着梁漱溟详细回顾了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梁漱溟不仅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就是苏联的党治在中国也不行，他始终认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 [1]《观察》第 3 卷第 4 期第 5－10 页。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国民党选举闹剧的愤慨，但整篇文章则在于从学理上讲述宪政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之原因，他的理解是既然不能实行，则不必强行。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能见出自己的性格，他对自己的理论抱有绝对的自信，他说：“廿年来，我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是有一整套主张底，并不止政治制度一项”[2]。梁漱溟是一个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文化有了解，但对中国文化更自信，特别是他搞过乡村运动，对基层的社会生活更有深刻的体察，另外，他是一个试图把自己的理论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论著，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在寻求知音，寻求能够实施自己理论的政治操作者，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曾经一度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缘故。

在他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便退出政治中心，著书立说，独善其身了。梁漱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传统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美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生。曾有人指出，梁在政治上很幼稚[2]，这也体现了梁漱溟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色。梁漱溟一生曾有异常活跃的时候，但在这篇文章中却透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他说：“我怀此见解主张，既二十年，虽曾埋头工作于乡村，顾未得高明之士，唱和于学术界。自愧不学，尤苦无友，怅梁前途之艰难，不知何以负荷”[3]。[2][4]《观察》第 3 卷第 4 期第 5－10 页。

[3]参阅艾恺著《梁漱溟传》中译本第 290 页，湖南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梁漱溟的这篇长文是以引用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一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的，他认为张东荪有些意见与他颇为相近，很快张东荪即在《观察》第 7 期上发表了《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

张东荪的文章不是与梁文商榷，而是由梁文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在宪政问题上他基本同意梁的观点，但这种同意是态度上的相同，而在解释上却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宪政在中国难以实行固然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势力”，这种“特殊势力”常常利用选举来谋私利，而这“特殊势力”的产生又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

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了他“甲橛”和“乙橛”的观点。他说：“最近《大公报》专栏上有费孝通者一篇《行政基层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点颇得我心。他认为中国政治轨道有两个，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虽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用语容易导人于误解，但事实上，确有这样两橛的分别。所以我特别避用这些容易误会的名词，而只把上一橛名为甲橛，把下一橛名为乙橛。甲橛是皇帝的政权与官僚的政治。乙橛是乡民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实行的互助。这种互助并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时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就中尤以社会方面为多”[5]。 [5]《观察》第 3 卷第 7 期第 3－6 页。

张东荪观察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人民对土皇帝的受不了实基于全国性的皇帝”[6]。他认为，后世儒家无不采道家其主要之点就在于想用种种方法和希望在甲橛下仍保留乙橛，不使甲橛完全把乙橛吞没了。由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护乙橛。从这样的观点看，他始终认为儒家在历史上可以说尽了他的使命，他们总是想在甲橛吞并乙橛的压迫过程中设法抵抗。他说：“中国古人（先儒）没有人主张把皇帝废除，这决不证明他们是为皇帝张目。因此，我对于儒家的看法和现在时流论客很不相同。我以为儒家在历史上说得好些是功多于罪，说得坏些亦只是功罪参半，而断不可认为完全是罪人”[7]。接着，张东荪以甲橛和乙橛的观点，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西方多是“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天下式国家”。民族国家把甲乙橛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一元的。而凡民族国家所有的制度和办法搬到天下式国家来，除了助长政府的权力，使其对人民更加高压和榨取以外，没有别的，而毛病就出在中国文化上。 [6][7]《观察》第 3 卷第 7 期第 3－6 页。

在梁、张的文章之后，经济学家樊弘在《观察》第 3 卷 14 期上发表了《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一文。樊弘认为，梁张两人提倡的是通儒政治，而这是行不通的。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经济特征之后指出：“为什么民主政治在中国屡试而败呢？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滞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敢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今天，始终没有造成一个可与地主阶级对抗的资本家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为旧社会所竭诚拥护”[8]。

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问题要看将来中国的工业是否走资本主义的老道，如果是，中国自然需要民主，如果不是，也不就是完全不需要民主，而是不需要具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民主了。他预言：“中国今后还有一个劳动万能的时代。今后中国的建设需要由中国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同时中国的民主政治亦需要这个伟大的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9]。 [8][9]《观察》第 3 卷第 14 期第 5－8 页。

与樊弘文章同时，梁漱溟又写了《略论中国政治问题——答张、费二先生》，对于张东荪的文章和费孝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再论双轨政治》一文进行了答辩。梁漱溟认为张费二先生在许多方面误解了他的意思，然后

又逐条阐释了自己对政治的看法[10]。　　　　[10]《观察》第 3 卷第 14 期第 9－11 页。

樊弘文章发表之后，张东荪又写了《敬答樊弘先生》一文。首先声明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通儒主政之说，然后指出他与樊弘看问题的态度不同。他认为，一种政治理想由于人们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实现，是一件事，而这个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类幸福，又是一件事；这样在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情况.，一种重现实，一种重理想。

注重现实的以为一切都是由现实推演而成，高谈理想的以为必如此如此为算为好，其弊在于绝尘而奔。但注重现实也难于说清为什么会有进化。张东荪认为，两者都趋于极端，都有毛病。

张东荪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未即全体努力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对此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他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并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11]。在文章的最后，张东荪指出樊弘所说的集体劳动在中国也行不通。[11]《观察》第 3 卷第 16 期 5－6 页。

张东荪的文章刊出后，樊弘立即又发表了《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最后答复梁漱溟先生和张东荪先生的指教》一文，樊弘认为，任何有益于大众的物质幸福的政治主张，其所以不能实行，多半不是由于这种理想缺乏哲学的根据，而是由于他与特权阶级取得的收益方式相违背。他认为梁漱溟系统的政治理论是由少数高明深睿的哲学家来制出一个救国大计，而用这个救国大计，只可由少数人讨论，不能付之多数表决。

在樊弘看来，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必须首先对于特殊阶级表示态度，他说：“假如说一个人的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极力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各阶级联合起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那么我便觉得这种主义大有实现的余地，我所谓的被压迫的阶级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特权的或压迫的阶级立于对立地位的一切的阶级。假如说，一个主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不去主张或拥护被压迫的阶层，或不是主张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各阶层，必须一起联合起来，推翻被压迫的阶级的，那么，我便敢说，他的政治主张，无论说的如何好听，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权的阶级的统治地位，其结果一定是不能实现的”[12]。作为经济学家的樊弘，在思考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很显然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主张以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也正是他与梁漱溟张东荪分歧的根本所在。　　　　[12]《观察》第 3 卷第 18 期第 5－6 页。

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一在政治上是不仅有一个党（如苏联），

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13]。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地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13]《观察》第 3 卷第 23 期第 3－4 页。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一倾向。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14]。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 1948 年 4 月 10 日樊弘在第 4 卷第 7 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樊弘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 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

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 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 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面貌出现，而缺少那种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 战争的手段 ” 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14]《观察》第 4 卷第 3 期第 6－9 页。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 年 7 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 观察丛书 ” 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以一贯主张的“ 以增产而求平均 ” 反对“ 以再分配而求平均 ” 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 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 ”。张东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作为知识分子，他是

尽了他的天职的。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由于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观察》时期的争论，所以对于《观察》之外的有关争论就不再涉及了。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

1993 年是张申府诞生 100 周年，这位在五四时期即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历经多年被遗忘的命运之后，又有学人开始重新提起。我在本书中不可能全面评价作为哲学家的张申府，我只想从张申府与《观察》的一点偶然关系中指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从年龄上讲，在《观察》时期，张申府已是将近 60 岁的人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一代人，对储安平来说，张申府算是他的前辈。在《观察》78 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在 1948 年 10 月出版的第 9 期头条。

这篇短文对于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没有假如的。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他的悲剧命运不在于他讲错了话，而在于他讲对了。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的充分自由。1925 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预“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1]。 [1]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见《张申府散文选》第 511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

因了《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共

产党节节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不仅误解了张申府，而且也是以党派利益为起点得出的结论。我们何不细思一下：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所谓书生气十足，怕是对张申府缺乏深一层了解而得出的轻率结论，他绝对能想到自己的声音将要遭受的回应，他以一个和平主义者发出的人道呼声，不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没错。我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是，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预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发出“ 将革命进行到底 ”才是合理的吗？我们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后，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

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 呼吁和平 ”而应该“ 呼吁战争 ”，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呼吁和平 ”是一个永恒的追求，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信仰，对和平的漠视，是一个民族愚昧的表现，张申府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正反映了我们对和平的陌生。

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天然的向往，我们不能自己设定只有打败了对手以后才能获得和平，这种思路的逻辑前提是对方没有和平的诚意，可他们自己却忘记了用战争换取和平的代价是多么沉重。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我以为我们应当持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书生论政，唯负言责。我们不应当从一时一地、一党一派的具体利益出发去评价，而应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去分析。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张申府的命运在半个世纪之后所以还在缠绕着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于他悲剧命运中蕴含着中国社会中最为残暴的东西。张申府在 1945 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 [2] ？研究张申府命运的当代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实现一个不因言论而受迫害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以人类发展的长远目标为自己言论的基本原则，一个正常的社会绝不能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音不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对其加以迫害。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但他们的命运也几乎与张申府一样。 [2]《张申府：一个呼吁》，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 512 页，重庆出版社 1992 年 1 月。

我们回顾一下张申府讲了些什么话。

张申府在文章的一开始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 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谁正打得顺手，不说读书人了，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

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作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颇反感，如果天下一旦归于他们，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想一点更策略的方式，这是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的，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张申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自己正直的言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他理应得到人们的敬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张申府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呼吁和平》可以说是张申府对沉默中国的一份宣言书，我在读这份宣言书的时候，分明感到张申府呼吁和平，其实更多的指向并不在于参预战争的双方，而是对国人麻木状态的痛心疾首。他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已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

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不是政客，所以他不能为某一党某一派的利害说话，这就是他不同于同时代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选择的重要之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张申府在历史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以人道的立场，

以良知发出的呼吁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言议政，以言参政作了一项尝试，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他身上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品德是值得后人深思的，至少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受过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成为特立独行的人，张申府是这样，他的晚辈储安平也几乎走了一条与他相同的道路，这种知识分子身上才寄托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应该记住，在半个多世纪前，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生命启示着未来的中国人：热爱和平。

《观察》与学潮

《观察》存在时，正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观察》在这时期几乎介入了一切与国家前途有关的大事，成为研究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刊物。《观察》是一个政论性的周刊，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给予特别关注，举凡一切有关政治生活的事件《观察》都有极为详细的报道。读过《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储安平对于新疆问题、台湾问题表现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观察》曾出版过有关新疆问题的专号，对于北塔山事件，西康民乱，台湾二二八事件都有详细报道，这可能与储安平对新疆问题的兴趣有关，也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情感，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统一问题的关切[1]。 [1]《观察》第 1 卷第 14 期。

在 1946 年至 1948 年间，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件事情影响极大，那就是所谓的学潮问题。《观察》对学潮的详细报道、评论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评价。研究《观察》，特别是注意它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个侧面。

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潮的不断兴起，史家自有评价，具体情况，我不愿详述。我只想指出，在这一时期爆发的学潮集中体现了当时热血青年对国家的强烈不满，至于这类学潮是否像后来历史研究中所认为的是有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我不予评价。从大量已披露出的历史资料看，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学潮是可能的，但它的作用显然被扩大了。

这是必须明确的，像历史上多数学潮的出现一样，它首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多数学潮绝非谁想发动，谁想领导就可以掀起的，我对学潮的看法是一般说来自发性是其基本特征，另外不管学潮最终结果如何，学潮总是对的。

1947 年后的《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报道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态，从沈崇事件引发的各地学潮、反美扶日突击大游行以及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观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观翔实的报道。

《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肯定学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我的热情。

二、对于由学潮引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论是支持学生，并保护学生的热情。

三、对于介入学潮的大学教授给予积极支持，对于教授在学潮中各种表现给予详细的报道。

四、对于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政府迫害学生不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呼吁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

储安平本人对于学生的一切行为有清醒的理性评价，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对于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观察》在整个办刊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热情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从没有责备过青年，对于青年的过激行为，储安平都给予宽容和理解，他总以为青年的热情是极为可贵的，容不得有少许的伤害。他认为 :" 我们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们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稳定谨慎，青年人可贵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没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没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社会 " [2]。 [2]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观察》第 3 卷第 16 期第 4 页。

对于学潮的不断出现，储安平的看法是：这绝不能怪学生，政府理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缔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风气，使一般纯洁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3]。《观察》对当时各大学学生的活动极为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也不惜篇幅加以详细报道。

因为在储安平看来，今日这一批青年在学校内部所受的民主训练，与二十年后中国政治的趋向有关。他认为，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看到每一个社会现象在日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此他希望 " 政府应当能创造一种新的风气，以这种新的风气来积极地激发青年的抱负，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单在消极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们的活力 " [4]。[3]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观察》第 3 卷第 16 期第 4 页。

[4]储安平《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观察》第 3 卷第 16 期第 4 页。

学潮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失过，从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以及发生在 40 年代中期以后的多次学运，从规律上看，一般引发不外二条，一是国家主权受到损害。二是现政权腐败。学潮很少有完全胜利的时候，但它在道义上总是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学潮的评价在 1949 年以前是这样几种态度：以大学教授为代表，他们首先是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学生，虽然他们常常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用这种行为和政府作对，他们本人一般很少直接介入学潮，但当学生在学潮中受到迫害时，多数教授一般能够挺身而出，出面具保，同时以签名和联合上书的方式抗议政府对学生的迫害，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学潮问题上，极少有大学教授站在政府一面指责学生的，这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1948 年，《观察》在将要被国民党查封之前，曾发表过文学史家刘大杰的一篇文章，名为《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

这篇谈历史上学生运动的文章显然是针对当时现实而言的。刘大杰认

为，任何一种思潮一种运动的到来，都有事实上的时代背景，都有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一个经济破产、社会腐烂、民不聊生的时代，知识青年发出不满于现状的呼声，对政治有所责难，对于现实有改革的要求，这是表示时局动荡不安的信号。对于学生运动，刘大杰是肯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他认为：“每一时代的统治阶级对于读书人都采取高压的政策，以大量的惨痛的屠杀，来消灭他们的力量，但后代读历史的人，对那些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言行，无不加以赞叹和同情”[5]。刘大杰的指向非常清楚，学潮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在于政府，在于统治者一面，对学生加以责难是毫无道理的。 [5]《观察》第 5 卷第 15 期 3－4 页。

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的专论，对于学潮的分析评价与刘大杰完全相同。

他认为，凡是一个社会现象，必有这个现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补救解决，而怪学生，只会垮得更快，他对学生的评价是：“学生挺身而出，对国家是表示一种抗议，实亦为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他们所以能肩负这个责任，一方面因为青年都怀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种不平则鸣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们幸而能有一种组织，在集体中表现其意志。”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6] [6]储安平《大局浮动学潮如火》,《观察》第 2 卷第 13 期 3－5 页。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完全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象。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

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7] [7]《观察》第 2 卷第 14 期 3－5 页。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了，可见它对学潮的留意。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8] [8]《观察》第 2 卷第 14 期第 17－18 页。

《观察》在第 4 卷第 7 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

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9] [9]《观察》第 4 卷第 7 期第 17－18 页。

赵超构在《观察》5 卷第 2 期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在文章中首先批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说法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当时的政府以烦扰，事后看来总是功多于过。”对于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处理过去以及以后的学生运动时，对于学生的政治表示有较宽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燥的心理状态，对学生随意加以审判[10]。[10]《观察》第 5 卷第 2 期第 3－4 页。

在赵超构文章发表后不久，《观察》又在 5 卷 4 期上以同样头条专论形式刊出了著名律师张志让的文章《评全国学生被捕事》，文章对于政府搜捕学生及为此设立的各种借口逐条进行反驳，对学生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还有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学生既为国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权，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学生加以迫害[11]。 [11]《观察》第 5 卷第 4 期第 3－4 页。

总括《观察》对学潮及学生的看法，我以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对学潮寄予同情，对学生的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用自己掌握的刊物，有组织、有意识地为学生进行呼吁，充分表达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学生遭到政府迫害后，《观察》能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这一切行为使我们对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有一定的认识，由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反观半个世纪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我们更强烈地感到争取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重要，丧失了言论自由的结果是使正义得不到伸张，无辜得不到援助，在无法发出正义呼声的国度里，知识分子是怎样地痛苦啊！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1929 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 20 岁的青年，虽然这时的他以资历和学识还没有资格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6 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

1946 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

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 38 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1]。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2]。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作出的选择）。 [1]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 5 卷第 13 期 1－2 页。

[2]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山西《黄河》杂志 1994 年第 2 期第 76 页。

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四十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

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作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3]，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 [3]储安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页。

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比如每卷的报告书及其它一些言论，我已有专文评述，这里只涉及他在《观察》时期的时评。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作为个人，

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4]。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4]可参阅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二十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5]。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6][5][6]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 1 卷第 3 期第 3、4 页。

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在近半个世纪后，我每读他的这些时评，依然感到很激动。'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这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在读储安平《观察》时评时，我却感到这些时评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 年后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再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性。1949 年后，几乎没有人能以自由的心态对国家发表独立的看法，所以也可以说政论这种文体也消失了。只有毛泽东的一些政论还能让人感到有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因为他是无所顾忌的。

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事朝野多有物议，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

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7]，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8]。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

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9]。“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10]。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 [7]储安平《论张君劢》，《观察》第1卷第19期第4页。

[8]储安平《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里所表现的态度》，《观察》第2卷第5页。

[9]储安平《一场烂污》，《观察》第5卷第11期第1页。

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11]。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12]。 [10]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3卷第9期第3页。

[11]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1－2页。

[12]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第4卷第9期第6页。

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

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

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13]。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13]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第4卷第10期第3页。

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份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14]。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预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

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15]。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　　　　[1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 3 卷第 9 期第 3 页。

[15]储安平《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观察》第 1 卷第 11 期第 6 页。

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16]。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16]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第 3 卷第 9 期第 3 页。

《观察》报告书的意义

《观察》创刊以后，每出满 24 期，要由编者储安平写一篇详细的总结报告，为论述便利，我在以下的论述中以"报告书"称之。

在《观察》已有的历史中，储安平共写过 4 篇"报告书"，第 5 卷由于中途被国民党查封，所以空缺，第六卷为复刊后《观察》，由于基本方针已变，所以例行的"报告书"也自然消失了。现存 4 篇完整的"报告书"分别是：

第 1 卷报告书《辛勤 · 忍耐 · 向前 · 本刊的诞生 · 半年来的本刊》

第 2 卷报告书《艰难 · 风险 · 沉着》

第 3 卷报告书《风浪 · 熬炼 · 撑住》

第 4 卷报告书《吃重 · 苦斗 · 尽心》

从"报告书"题目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储安乎是将"报告书"作为《观察》的一种风格连续下去的，这些"报告书"绝非一般应景式的总结，而是极其客观、严肃认真地向读者报告刊物的经营状况、发行情况以及编者所遇到的一切苦衷和想法，这些"报告书"是研究《观察》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储安平本人思想历程极为重要的资料。

作为一个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储安平在选择创办《观察》的时候，有过极为周密的考虑，他最终选定以办刊物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是在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支配下所做的严肃选择。

储安平在三十年代初即创办过《文学时代》，后来做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抗战时在湖南做过《中国晨报》的主笔，一生的事业与报刊结下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迈开了他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以言论政的第一步。我在本书的前面曾提到过在创办《观察》之后，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在大年三十夜写的，由此可见储安平对《观察》的感情。在储安平的理想中，有一点非常可贵的精神，那就是他时时处处强调立言与行事的一致性。在记述《观察》创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的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发表的议论不相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怀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1]。储安平在《客观》周刊已初有影响的时候，毅然决定另立门户，创办《观察》，主要原因就在于《客观》只由他主编，而不由他主办，看到此事难有前途，所以他才果断放弃了《客观》周刊。从储安平在第一卷“报告书”中所阐述的《观察》创办经过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主张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行事也时时以西方精神来严格要求自己。

冯英子在《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曾说过，储安平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靠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梦想缠绕了储安平整整一生，他的事业由这个梦想始，也由这个梦想终，储安平是一个极富浪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深远见识来自于对这种理想的执著追求，他始终认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变成现实。我们不能说储安平是天真的，因为《观察》在他手中存在近三年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其成功的。储安平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参预政治的一个成功实践者，储安平是一个在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上有过成功尝试的报人。 [1]《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7 页。

《观察》的“报告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年终总结，而是充满灵性、富有思想和创见的报告，虽然它是就某一具体时期刊物的整个情况而言的，但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到一个自由灵魂的跳跃，他是自由的，他是没有任何束缚的，他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努力把整个刊物的一切都详细报告读者，在报告书中，储安平每卷都做了极其认真的工作，他不仅统计了《观察》的读者分布，以地域分别报告，而且以行业分工为界，将《观察》的读者群详细地统计并报告给读者。

从报告书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储安平本人的思想状况，而且通过他翔实公布的读者情况，可以深入了解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储安平在第 1 卷的报告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清醒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认识是他创办《观察》的基本前提，也是《观察》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基本保证。储安平认为，当时国内已经拥有一批广大的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也应当说话。他还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在此判断上，储安平认定，《观察》确应当是无党无派的，说话公平，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知识界的支持。他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努力的价值。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还可以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面说话，而他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是因为他深切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

想分子的意见，对于当时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中国所极需。

储安平在第 1 卷报告书中始终强调《观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而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意见，他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 自由 ”与“ 宽容 ”精神。

储安平在整个《观察》时期，在言论的客观上，在识见的宽容上是有非常杰出表现的。

《观察》的言论能够体现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正声音，与储安平的这种风度是分不开的。

储安平自己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以这种原则为基准评论国是，同时他所做的又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在这种信念下，储安平对于热心组党的人颇有微词，他认为“ 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 ”[2]。他很赞同当时张东荪在《士的使命》一文中的观点，那就是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 执政 ”则是一种组党的做法。在此认识上，《观察》无意组党，所以没有具体主张，也无意去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储安平想做的是 :“ 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 国家 ’做的，不是为‘ 我们 ’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 群众 ’。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 种子 ’，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3] [2][3]《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7 页。

储安平在报告书中显得极有风度，无论报告财务还是本社同人的福利都很坦诚，绝无遮遮掩掩。尤其是对于自己，要求更是严格。在报告书中，他还专门报告了自己在办《观察》时期的活动情况。他说 :“ 在过去的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它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

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4]。[4]《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3－7 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的为国家建设做长远考虑的理想是一贯的，在第 2 卷“ 报告书 ”中，虽然所说多为具体的刊物经营编辑情况，但这期报告书依然表现出储安平一贯的风格。他始终告诫读者，《观察》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而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观察》的发行数是足以证明它可以自给，而无需仰求外援。储安平非常自信，对于《观察》的成功他有自己的评价，那就是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靠发行自给的。储安平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不要消极，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的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他希望各方面的有识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国家的生命。

《观察》在出满第 3 卷时，由于储安平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时《观察》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面对眼前的政治危机，储安平在第 3 卷的报告书中坦诚自己的心情，“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它。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5]。　　[5]《观察》第 3 卷第 24 期第 7－8 页。

储安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观察》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储安平对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有关民盟事件的评论都照发不误，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所持的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这是何等的气度。储安平认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6]。　　[6]《观察》第 3 卷第 24 期第 7－8 页。

1948 年 8 月 1 日，储安平为《观察》第 4 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7]。　　[7]《观察》第 4 卷第 24 期第 8 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彩，特别是 1949 年后，由于严格的新闻管制，人民完全丧失了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在这样无声无息的岁月里，当我重新回到《观察》的氛围中，我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健全的人格所感动。1946 年，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8]。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9]。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成功地为自由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储安平

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 40 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 [8]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 31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9 月。

[9]见《东方杂志）第 41 卷 18 号、20 号、21 号。

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 20 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 40 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 ;“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1]。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1]《观察）第 2 卷第 2 期第 8 页。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盈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

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 16 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贪》
何永信《中国在戥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　乾《红毛长谈》
樊　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14 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2]。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避嫌，他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真正民主风度。　　[2]《观察》第 4 卷第 24 期第 6 页。

胡适与《观察》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

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抄示的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这位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我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见过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 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此信不算长，亦抄示如下[1]：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39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出版。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
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
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
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
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
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
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
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
不如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

后来《观察》在第 3 卷第 7 朗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我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 1947 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2]：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225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出版。

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
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
《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
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我在研究《观察》过程中，仅见过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没有见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

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3]。我不知道列出储安平的名字是由于以上抄出的三封信，还是另外的。从我所见到的这二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一位后学对前辈的近乎崇拜的感情。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有近似于迷恋的感情，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一言一行都给予高度重视。在 1947 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对胡适的言论《观察》也多留意。《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4]。 [3] 耿云志《胡适私人档案介绍》，《新华文摘》1994 年第 2 期第 78 页。

[4]《观察》第 1 卷第 3 期第 4 页。

在整个《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唯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给费孝通的信且是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是由费孝通提供的。

这封信是针对《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给费孝通的，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5]。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错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我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现将胡适和费孝通的二封信抄录如下： [5]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 205 页，三联书店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 [6] [6]《观察》第 3 卷第 4 期第 23 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中，收入了费孝通致胡适信的全文。略去的部分是：“接到八月廿五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兴，高兴的是因此从此可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奇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以免误及读者。”“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可作为消遣之用。”(见该书第 233 页)。

一

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

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邱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

邱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

的 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

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 North， 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

“原来他是 North 将军的后裔， 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

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

相 Lord North。 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
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
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
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
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
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
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
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
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
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甫创刊，即在《观察》通讯的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7]。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非常客观的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7]《观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21 页。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那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在极大的苦闷中既没有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也没有对共产党抱有过高的希望，就他们当时的理想而言，多数人希望通过走民主和宪政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局面，具体而言，盼望胡适能够组织新党，或者创办刊物，以自由的言论影响国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的追求似乎有些天真，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现实，但这种理想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中，成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对于胡适的行踪和言论颇多留意，这都是研究胡

适的重要资料，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

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8]。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这种言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我认为是理智的。虽然他的这种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有帮助作用，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要让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8]《观察》第 3 卷第 21 期第 17 页。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象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

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9]。听到有学生被打伤和被捕时，胡适总是赶到医院去探望并设法营救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理解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9]《观察》第 2 卷第 14 期第 19 页。

《新路》与《观察》

《新路》与《观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将两个几乎同时期出现的刊物联在一起，是从他们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着眼的。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的命运更引人深思。

由于《新路》比《观察》更少为人所知。我想先介绍一下有关《新路》的情况。

先从萧乾与《新路》的关系说起。

萧乾在晚年回忆起 1948 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 至 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 1956 年解下过几个月"[1]。　　[1]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 219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 年 9 月版。

从萧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

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2]。 [2]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 219 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 年 9 月版。

萧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萧乾当时的处境，让他承认《新路》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刊物也不现实，从高压下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萧乾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的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

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 1979 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倒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巴金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3]。 [3]《巴金书信选》第 44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

事实是，1948 年 1 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二栏[4]。 [4]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 23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 2 月版。凌宇《沈从文传》中所述萧与沈的矛盾与分歧，与当年沈未参加《新路》的筹办有关，见该书第 413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 10 月版。

现在我们再回到《新路》的情况。

1948 年 3 月 1 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 3 月 2 日的会员大会上，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新路》的创刊号是 1948 年 5 月份出版的。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 24 期，时间是 1948 年 10 月 23 日。第 2 卷出至 6 期，即停刊，时间为 1948 年 12 月 18 日。

《新路》在第 2 卷第 1 期上曾发表过”—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从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创办刊物时的心情和不计个人私利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急迫心情，我将全文抄在下面[5]： [5]《新路》第 2 卷第 1 期第 2 页。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

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

‘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

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

袒护匪谍，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项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饬办等因，奉此，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一个见解，就是在究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事，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的向人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新，只知压迫逆斗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

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斗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作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

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

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

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

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

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

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未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

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

在以往中国的现代史研究中，对于《新路》，都未能从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角度出发，深切理解他们的苦心，对他们所阐述的主张都笼统地以走第三条道路，不切合中国的实际，过去中国的国情没有允许它实现，今天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等观点加以否定[6]。而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6] 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第 372－373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版，黄河编著《北京报刊史话》第 198－199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当时国内的形势，这些大学教授绝不会毫无察觉，如果有一点为个人考虑的投机心理，完全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即使不投机，做静观的姿态，也不会去创办《新路》这样的刊物，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 1948 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能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将现代和传统连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7]。[7]《观察》第 4 卷第 4 期第 2 页。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 4 卷第 4 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固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

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

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

实业
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 新第三
方面 ”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
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
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
政党，所以说它是“ 新第三方面 ”，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个新
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
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长此
窒息下去，人们的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
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
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恭维
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朋友
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在《观察》“ 文学艺术音乐戏剧 ”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观察》的宗旨我在本书中已有介绍，现在我把《新路》的发刊词也抄在下面，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大学教授在思想和行为上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理智[8]。 [8]《新路》创刊号第 2 页。

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
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

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这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一种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权为合理的一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者，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

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
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
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
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
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
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
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
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
低头就范。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
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
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
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
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
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人自
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将事。我们希望
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
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等悲哀啊，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的前辈们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我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

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青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

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它的编者储安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在《观察》上发表大块文章的人，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教授。《观察》每期对文章作者有一简要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多数人是在大学任教的，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观察》是一个教授的刊物。

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这个群体带有西方中产阶级的性质，无疑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那是因为我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的各类人群中是最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的，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这些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1]。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持人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2]。 [1]张东荪《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附记，见《观察》第2卷第6期第27页。

[2]沈云龙《光华大学杂记》，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4页。

我这里着重分析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是想说明中国的大学教授在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这种精神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过，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

这里有几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第一，在1949年以前，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从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的情况已为大家所知，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整个精神状态足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可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3]。然而，

张申府的话等于白说了——1949 年以后，正是那些最守规矩的大学教授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学术水平自然也就一落千丈。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应该对抗战胜利后到 1949 年前这几年给予特别重视，不能只重视这一时期主战的言论，更应当理解主和者的心情。 [3]《张申府：一个呼吁》，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记实》下卷第 515 页，重庆出版社 1992 年。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抗战胜利后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

一、对西南联大精神的推崇

1946 年 7 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在一篇很长的《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作为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要作者的刊物，《观察》对校园生活所表现出的兴趣表明，在中国，大学是一块集中了新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地方。这里相对中国社会的其它角落有更多的民主传统，宽容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天然地肩负有领导青年思想的重任。储安平办《观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给国家多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学识上要有西方的精神，其次在做人做事上也要如此，既要有思想的力量，同时也更要有道德和修养。正是出于这样的理想，《观察》对大学中教授和学生的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的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结出的美丽花朵。

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4]。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个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功典范。《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叙述如下。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4]见《观察》第 1 卷第 6 期第 17 页。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

称联大是“ 民主堡垒 ”或“ 自由堡垒 ”，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 中心 ”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 教授治校 ”。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二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极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民主堡垒 ”，真正的“ 自由堡垒 ”。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当然，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十分好，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造就了不少的人才[5]。 [5]参阅《观察》第 1 卷第 6 期第 17－18 页《本刊特约记者文章》。

二、对学潮的同情

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察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整个《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对学潮的看法，我们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预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学潮中的表现会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常的，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的整个精神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他们虽然有自己远离政治的专业，但同样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所以教授对时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另外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

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有些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讲。

《观察》的一篇通讯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6]。虽然从以后的变化中，我们了解到在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员，但在对学生运动的一些基本评价上，他们是没什么分歧的。在清华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能见出他们的性格： [6]《北大"三·二九"前后》，见《观察》第4卷第7期第14页。

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7] [7]《清华园：让血化为更坚强的力量》,《观察》第2卷第14期第20页。

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大学90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教授。他们认为：

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的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

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藉暴行

来挑衅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

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层

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

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

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

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

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

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再演

一幕同样的惨剧，抵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8] [8]《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见《观察》第4卷第10期第2页。

从这抗议中，我们不难感到当时的大学教授是何等的临危不惧，大义直言。类似的宣言《观察》还发表过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

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 6 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9]。 [9]《观察》第 2 卷第 15 期第 21 页。

三、抗议政府的勇气

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己带来不利。我这里所谓的教授还仅限于那些只活动在大学校园中，没有直接介入到具体政治运作中的教授。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远离社会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当时的社会也把大学教授作为最公正的代表，就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也认为大学教授总是能讲公道和主持正义的。这种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他们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批评政府，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论去治他们的罪，大学教授在抗议政府的腐败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一致性是他们不畏强暴的力量源泉。在《观察》时期，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大学教授对政府毫无顾忌的批评。以下是登在《观察》上一篇大学教授的宣言[10]： [10]《观察》第 2 卷第 2 期第 21 页。

保障人权

宣言者： 朱自清 向 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达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 汤用彤 杨人楩 钱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

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囹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

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于汝

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博士，

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学生

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民自

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发

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

为保

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之人

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不再

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在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徐毓丹、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11]，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　　　　[11]《观察》第 3 卷第 8 期第 3 页。

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朱自清、陈达等 48 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2]，他们本着“ 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 ”，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12]《观察》第 3 卷第 11 期第 3 页。

在《观察》时期，特别活跃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尤以那些以法学为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人对于政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13]。[13]可参阅楼邦彦《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韩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分别见《观察》第 2 卷第 13 期，第 4 卷 10、22 期，第 3 卷 11 期。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历史既然记住了储安平，那么也就不会忘记《观察》。《观察》在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把这种必然性理解成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执著追求。虽然从 1946 年 9 月到 1948 年 12 月，《观察》的存在时间不足 3 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格意义上的《观察》实际只能算在 1948 年底）。

一、关于“《观察》撰稿人 ”

这里的“《观察》撰稿人 ”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 ”，储安平在 1947 年初，《观察》出满

第 24 期后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 ”有一段详细论述，我抄在下面：

我们拟了一张“ 拟约稿人名单 ”，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
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 拟约稿人
名单 ”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
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 遵约担任 ”或“ 不克担任 ”上作一符号，可
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
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
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
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
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
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 不克担任 ”，有 8 位先生迄无复
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 遵约担任 ”，并
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
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 特约撰稿人 ”，我们深不以此种
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
用“ 特约撰稿人 ”一词，一律称为“ 撰稿人 ”，目的在位本刊的撰稿人在
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 70 位撰稿
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1]。

[1]《观察》第 1 卷第 24 期第 4 页，1947 年 2 月 8 日出版。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我们对于“《观察》撰稿人 ”可以做这样的评价，首先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 五四 ”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用储安平的话说 :“ 我

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做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2]。今天虽然我没有见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 缘起 ”，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观察》撰稿人 ”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如果他们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宣扬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真了，但他们压根就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不切实际，他们的所做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错[3]。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看不惯[4]，其根源不在于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美国学者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但是他们大都过分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不怎么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5]，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但为什么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因为来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所崇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这种天性被扭曲的越厉害，其表现的方式也就愈不同。1949 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 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年轻的学生知识分子，比如像林希翎那样的人，也自觉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1966 年“ 文革 ”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 10 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但在 1978 年以来，在 20 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仍无不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甚至像一些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终都转向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往。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主要倾向，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尽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公开和广泛地宣扬过。

[2]《观察》第 1 卷创刊号第 3 页，1946 年 9 月 1 日出版。

[3]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中有非常细致的论述，他认为人类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即此种自由在当时还不曾获得而有待于追求，时代进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进一步，故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见《观察》第2卷第19期第3页，1947年5月10日出版。）

[4]可参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有关文章。

[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60－204页，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储安平在《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以后，当时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过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看法，陈衡哲的这封信我以为代表了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信不算长，我照录如下：

安平先生：《观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国的政局》已仔细拜读，不胜

同情钦佩……所记关于自由思想分子的一节，可谓真知灼见。惟问题是：

政党既必须借重权力才能发挥力量，而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又

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则假使要他们用权力来组织一个政党，用利害来维

系他，这不正与那个传统精神相反？这不是吃热的冰淇淋？对于这个情形，

在未读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过，但结果总觉得，政党这条路不易走

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冰淇淋若热了，便已失去他的中心价值，故

自由思想分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组织政党的方法来发挥。我

们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则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几

种类似：（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

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袖地位。（三）

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故我

以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妨是看英国的政党；但远水不救近火，自由思

想分子在最近将来的使命，恐怕仍须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道德及思想方

面）；然后再由此企求达到最终目标。至于如何方能达到这目标，则诚非

此信能畅论；但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似乎可以先把此问题的主要症

结，

先做一番考虑与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传统恶习惯？

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第三，如何去造成一

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

（哲近年在论文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于中国社

会的缺少公道，而主张公道者之饱受孤寂与侮辱也）。此三个条件有一不

具，自由思想分子就决无结合的可能，而更不用说组织政党了[6]。

[6]《观察》第3卷第12期第23页，1947年5月17日出版。

二、储安平、徐铸成的一段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所提到的有位“不克担任”的撰稿人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的《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 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John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7]。徐铸成在《我的同乡》一文中则这样写到：“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 1942 年。他在湖南蓝田园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 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 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等等”[8]。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 8 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喧。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

就有 6 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9]。 [7]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 168 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6 月出版。

[8]徐铸成《风雨故人》第 90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出版。

[9]《观察》第卷 14 页第 7 页，1947 年 5 月 21 日出版。

这就是当时储安平和徐铸成之间的一段交往。历史的发展真是奇妙，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 “ 未予答复 ”，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 1957 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 “ 党天下 ”，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10]；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 1957 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储安平与徐铸成的经历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最终结局的不同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曾详细比较过 1957 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是出于无奈所做的，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徐铸成的检讨比储安平的要具体得多[11]。不过由于储安平和徐铸成都曾经历了 1957 年的夏天，都曾给自己人生经历中增添了一些不平凡的东西，我也就不愿再以两个人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去臧否两个都已作古的老人了。 [10]关于储安平的最终结局，戴晴认为他于 1966 年在北京投河自杀，见戴著《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 226 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1991 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 1615 页收有 “ 储安平 ” 一个词条，该书认为储 “ 1966 年逝世，年 57 岁 ”。1993 年《炎黄春秋》第 1 期刊载逸馥、邓加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详见 1993 年 2 月 24 日四川《文摘周报》第 4 版《储安平你在哪里》一文。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 53 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中也认为储 “ 还要被迫跳海 ”。第 54 卷 5 期载有《储安平 “ 文革 ” 受难死》一文中也持此说。冯英子说 ：“ 对于储安平的失踪，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新疆劳改时逃到苏联了，一是往东到青岛跳海了，但谁也说不清楚。” 见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第 879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版。董乐山在《闲话皇帝》一文中说 ：“ 储安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这可当何解呢？ ” 见 1993 年第 3 期广东《随笔》第 65 页，可见对于储的生死尚有疑问。

[11]详见 1957 年 7 月 14 日《光明日报》，1957 年 8 月 22 日《文汇报》。

三、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 ：《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三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他们三个的经历、学识以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

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撰稿人，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2]。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12]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 178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出版。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 1910 年生人。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13]。在《观察》近 3 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设》都是 1947 年做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 34 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4]。费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15]。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 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 1949 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

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 是最后胜利的前兆 ” [16]。在 1957 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 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17]，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 :“ 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 ”。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13]储安平在《观察》第 1 卷第 4 期上曾发表过钱钟书给他的一封信。至于费孝通，林元曾说过他到《观察》工作就是费孝通推荐的，见林元《碎布集》第 400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 2 月。

[14]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 397 页。

[15]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 1 册第 71 页，华夏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

[16]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 1 册第 105 页，华夏出版社 1991 年 7 月出版。

[17]1980 年以后，费孝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心，他曾先后写了《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议》等文章，一直呼吁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重视。详见《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 5 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 4 篇文章的题目：

《说 “ 回家 ”》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 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 ” [18]。《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持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难怪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 :“ 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是一个比较 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 [19]。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能见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 1957 年没有落入 “ 右派 ” 的行列中，但 1966 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

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菜了。其实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20]。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历史，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尊敬，多变是他人生最大弱点。但人们评价一个人物，常常会以他们晚年的忏悔或逢人作揖、见人道歉而使人们不计较他的以往，我对这种人大不以为然。一些曾经迫害过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在晚年的忏悔固然能够赢得一些人的好感，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懂得，你要对那些特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忏悔，可能就有一千次，对他们的忏悔给予正确评价的时候，绝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像周扬这样的分子。　　　　[18]《观察》第 2 卷第 1 期。

[19]水晶《侍钱“抛书”杂记》，见《钱钟书研究》第 2 辑第 325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 月出版。

[20]杨绛《干校六记·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2 月出版。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同年出生，同为江苏人，同为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英美。事后分析，三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观察》时期就已经预示了。

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 1957 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是最清醒、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的人，这是他比他同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更为人尊敬的地方。1957 年 1 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储安平 1949 年以后写的唯一一本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这本以歌颂 1949 年以后新疆新生活的通讯集可能真实地反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真实感情，但对储安平来说，这种纯粹游记性的文章从另一面说明了他的不得已，从储安平历来对新疆问题的兴趣看，他应该写的绝不是这类文章，储安平的悲剧说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中，深刻、清醒、执著的追求也是最不幸最艰苦的追求，纯粹的超然物外或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都比一味地按自由主义的理想行事要安全得多。从办《观察》的储安平到办《光明日报》的储安平都是一个人，但《观察》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储安平的生命，《光明日报》没有结束，而储安平的生命倒结束了。

四、《观察》撰稿人简况与分析

我把当年《观察》撰稿人的情况列了一个简表，并做如下分析：

第一、从《观察》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第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许德珩、任鸿隽、傅斯年、张东荪、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驌等一批 19 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 10%左右。

在《观察》时期除部分人外，这批人不是最活跃的。在《观察》时期，胡适是年龄仅次于许德珩的一位，但胡适在《观察》上没有多写文章，虽然储安平作为后学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请他为《观察》撰稿，而胡适只在《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人性格的信。

从当年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储安平在精神上是将胡适视为自己前辈和领袖的[21]。这可以说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与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储安平是当年《新月》社晚期的一个撰稿人，而《观察》在整个办刊思想甚至具体的编务方面都带有 20 年代《现代评论》《新月》的色彩，这种联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承传关系。 [2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储安平给胡适的三封信，都与《观察》有关。

第二、《观察》撰稿人主要是 20 世纪初出生的人，具体时间约为 1900-1910 年前后。

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40 年代最为活跃，因为单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 50 岁以下，其中多数人是不满 40 岁，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 1957 年，从那以后，《观察》撰稿人一个是年龄基本要步入老年，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上的高压和专制，已使他们那颗自由的心灵深深埋入了内心。为了生存，要么完全退入到自己的专业范围以内，要么是在思想上被迫作一些妥协，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 1957 年之后《观察》撰稿人一直保持平静，甚至偶尔也写一点违心文章的缘故。

第三、从《观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第四、从留学背景看，《观察》撰稿人除个别人是留日的以外（约有 3 人），约有 4 人是留学德国的，其余全部是留学英、美的。

第五、从《观察》撰稿人的职业分布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如陈之迈、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从专业分布的角度看除任鸿隽、戴文赛、胡先驌、曾昭抡等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多数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法学、社会学、新闻和文学的为多。

第六、1949 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几人离开大陆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这个统计非常令人深思，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 1949 年都绝对有离开大陆的条件，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虽然对时局的变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可以说已经预见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对于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来说，他们至少不会对未来没有一点自己的评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来了，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释他们去留中所隐含的文化根源，但只要相信大部分人留下来这个统计，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对国家民族所抱有的赤诚进行怀疑，然而 1949 年以后的历史却没有理解他们这批人选择中所包含的民族感情，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摧残。虽然《观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杨刚、徐盈、李纯青这样的共产党人，但多数是无党派人士。

第七、1957 年夏天，《观察》撰稿中有很多人被打成了“ 右派 ”，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费孝通在 1957 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文章已远不如《观察》时期的生动鲜活，大胆直言，但他也难逃“ 右派 ”的命运。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倒是仍能见出他的一贯性格，其命运也就最为悲惨。萧乾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难逃厄运。还有马寅初、雷海宗、曾昭抡、徐盈、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等人。对活跃的《观察》撰稿人来说，1957 年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劫难，一方面执著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们不会在专业之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国民党时期放言论政的经历，加上对引蛇出洞卑鄙伎俩的轻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结局再坏能坏到哪里？总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然而他们过于轻信别人了，将要到来的灾难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到了 1966 年，《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了。如果再将没有列在《观察》撰稿人名单中，但给《观察》写过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冈、徐中玉、邵燕祥等人的结局统计在内，就更能见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了。

《观察》撰稿人简况①

说明

1．本表按原《观察》封面所列撰稿人顺序排列。

2．原刊撰稿人共 78 人，本表全部照列，但由于笔者资料有限，本表中尚有王迅中、何永佶、周东郊、孙克宽、沙学浚、钱清廉共 6 人不知详情，在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类综合性、专业性的辞书和传记资料一时查不到其下落，诚盼知情者能和笔者联系。

3．关于撰稿人 1957 年的情况各种资料也大都回避，所以笔者在这方面所获情况也极其有限。

4．尽管本表很不完备，但由于已知撰稿人已有 72 人，约占撰稿人的近 90%，作为初步统计资料，尚不失一定的客观性。

5．由于 1966 年“ 文革 ”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遭到不幸，作为《观察》撰稿人情况自然也可想而知，所以本文不统计 1966 年的情况。

6．作为《现察》主编的储安平没有把自己列入《观察》撰稿人名单中，但本表将其列入，这样《观察》撰稿人实际上是 79 人。

姓 名	籍 贯	生卒年

			毕业大学	留学国家	专业	1949 去向	1957 年变化
卞之琳	江苏海门	1910－	北京大学	英国旅居研究员	诗人	大陆	
王芸生	天津静海	1901－1980			新闻	大陆	
王迅中							
王赣愚	福建福州	1906－	清华大学		政治学		
伍启元	广东台山	1912－	沪江大学	英国	法学	台湾	
任鸿隽	浙江吴兴	1886－1961	清华大学	日本、美国		台湾	
吕　复	河北逐鹿	1887－1951		日本	社会学	大陆	
何永佶							
沈有乾	江苏吴县	1900－	清华大学	美国	哲学		
吴世昌	浙江宁海	1908－1986	燕京大学	英国	古典文学	英国	
吴恩裕	辽宁沈阳	1909－1979	清华大学	英国	社会学	大陆	
吴泽霖	江苏常熟	1898－1990	清华大学	英国	民族学	大陆	
李纯青	台湾台北	1908－1990	南京中央政治学校	日本	新闻	大陆	
李浩培	上海市	1906－	东吴大学	英国	国际法	大陆	
李广田	山东绍平	1906－1968	北京大学				

| 文学 | 大陆 |

| 沙学浚 |

| 周子亚 |
浙江杭州 | 1911－ | 中英大学 | 德国 | 政治学 |
大陆 |

| 周东郊 |

| 宗白华 | 江苏常熟 |
1897－1986 | 同济大学 | 德国 | 美学 | 大陆 |

| 季羡林 | 山东临清 | 1911－ |
清华大学 | 德国 | 语言学 | 大陆 |

| 胡　适 | 安徽绩溪 | 1891－1962 | 清
华大学 | 美国 | 文学 | 台湾 |

| 胡先骕 | 江西新建 | 1894－1968 | 清华
大学 | 美国 | 植物学 | 大陆 |

| 柳无忌 | 江苏吴江 | 1907－ | 清华大
学 | 美国 | 文学 | 美国 |

| 徐　盈 | 山东德州 | 1912－ | 南京金陵大
学 | | 新闻 | 大陆 | 右派 |

| 孙 克 宽 |

| 马寅初 | 浙江绍兴 | 1882－1981 | 天津北洋大学 |
美国 | 经济学 | 大陆 |

| 高 觉 敏 | 浙 江 温 州 | 1896 － | 香 港 大 学 |
| 心理学 | 大陆 | 右派 |

| 许君远 | 河北安国 | 1905－ | 北京大学 |
新闻 | 大陆 | 右派 |

| 许
德珩 | 江西九江 | 1890－1990 | 北京大学 | 法国 | 政
治学 | 大陆 |

| 陈
之迈 | 广东番禺 | 1908－1978 | 清华大学 | 法国 | 政

治 | 台湾 |

| | 陈友

松 | 湖北京山 | 1899— | | 美国 | 教育

学 | 大陆 |

| | 陈衡

哲 | 湖南衡山 | 1893—1976 | 清华大学 | 美国 | 文学

| 大陆 |

| | 陈瘦竹 |

江苏无锡 | 1909—1991 | 武汉大学 | | 戏剧 |

大陆 |

| | 陈维稷 | 安徽

青阳 | 1902—1984 | | 英国 | 纺织 | 大

陆 |

| | 夏炎德 | 上海

市 | 1911— | 暨南大学 | 英国 | 经济 | 大

陆 |

| | 曹　禺 | 天津

市 | 1910— | 清华大学 | | 戏剧 | 大

陆 |

| | 梁实秋 | 北京

市 | 1902—1991 | 清华大学 | 美国 | 文学 | 台

湾 |

| | 张印堂 | 山东泰

安 | 1902— | 燕京大学 | 英国 | 地理学 | 大陆

|

| | 张沅长 | 上海市 |

1905— | 复旦大学 | 美国 | 文学 | |

| | 张忠绂 | 湖北武昌 | 1901—1977 |

清华大学 | 美国 | 政治学 | 美国 | |

| | 张德昌 | 河南林县 | | 清

华大学 | | 政治学 | 香港 | |

| | 笪移今 | 江苏句容 | 1909— |

| | 经济学 | 大陆 |

| | 黄正铭 | 浙江海宁 | 1903—1973 | 中央大学 |

英国 | 法学 | 台湾 |

| | 郭有守 | 四川资中 | 1900— | 日本某大学 |

日本 | 教育学 | 台湾 |

| | 章靳以 | 天津市 | 1909—1959 | 复旦大学 |

					文学	大陆	
冯　至	湖北涿州	1905－1993	北京大学	德国	哲学	大陆	
冯友兰	河南唐河	1895－1990	北京大学	美国	哲学	大陆	
程希孟	江西南城	1900－		美国		大陆	
曾昭抡	湖南湘乡	1899－1967	清华大学	美国	化学	大陆	右派
傅　雷	上海南汇	1908－1967	上海持公大学	法国	文学	大陆	右派
傅斯年	山东聊城	1896－1950	北京大学	美国、德国	历史	台湾	
费孝通	江苏吴江	1910－	清华大学	英国	社会学	大陆	右派
杨　刚	湖北沔阳	1901－1957	燕京大学	美国	新闻	大陆	
杨　绛	江苏无锡	1911－	清华大学	英国	文学	大陆	
杨人楩	湖南澧陵	1903－1973	北京师大	英国	历史	大陆	
杨西孟	四川江津	1900－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大陆	
叶公超	广东番禺	1904－1981	清华大学	英国、美国	外交	台湾	
雷海宗	河北永清	1902－1962	清华大学	美国	世界史	大陆	
赵家璧	江苏松江	1908－	上海光华大学		编辑	大陆	
赵超构	浙江瑞安	1910－1991	中国公学				

新闻 | 大陆 | 右派 | |

| | 潘
光旦 | 江苏宝山 | 1899－1697 | 清华大学 | 美国 | 社
会学 | 大陆 | 右派 | |

| | 蔡
维藩 | 江苏南京 | 1898－1971 | 南京金陵大学 | 美国 | 世
界史 | 大陆 | | |

| | 刘
大杰 | 湖南岳阳 | 1904－1971 | | | 文
学 | 大陆 | | |

| | 楼邦
彦 | 浙江鄞县 | 1912－1979 | 清华大学 | 美国 | 法学
| 大陆 | 右派 | |

| | 钱能欣 |
浙江湖州 | 1917－ | 北京大学 | 法国 | 国际问题 |
大陆 | | |

	钱清廉

| | 钱歌川 | 湖南湘潭 |
1903－ | 日本某大学 | 英国 | 文学 | 美国 |
| |

| | 钱端升 | 上海市 | 1900－1900 |
清华大学 | 美国 | 政治学 | 大陆 | 右派 | |

| | 钱钟书 | 江苏无锡 | 1910－ | 清
华大学 | 英国 | 文学 | 大陆 | | |

| | 鲍觉民 | 安徽巢县 | 1909－ | 中央
大学 | 英国 | 经济地理 | 大陆 | | |

| | 戴文赛 | 福建漳州 | 1911－1979 | 燕京大
学 | 英国 | 天文学 | 大陆 | | |

| | 戴世光 | 天津市 | 1908－ | 清华大学
| 美国 | 统计学 | 大陆 | | |

| | 戴镛龄 | 江苏镇江 | 1913－ | |
英国 | 外国文学 | 大陆 | | |

| | 韩德培 | 江苏如皋 | 1911－ | 东南中央大学 | 美
国、加拿大 | 法学 | 大陆 | 右派 | |

| | 萧　乾 | 北京市 | 1910－ | 燕京大学 |

				英国	文学	大陆	右派
萧公权	江西泰和	1897－1981	清华大学	美国	政治学	台湾	
顾翊群	江苏淮安	1900－	北京大学	美国	经济学	台湾	
储安平	江苏宜兴	1910－1966	光华大学	英国	新闻	大陆	右派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源于：

王明根主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出版。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陈荣富、洪永珊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李盛平主编《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出版。桥川时雄主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日文版）中华法令编印馆昭和 15 年（民国 29 年）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传记文学》第 1－54 卷，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1－11 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出版。高增德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10 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清华校友通讯》复 12 期。

从复刊后的《观察》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

很久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评价上，我一直处于一种困惑的地步。

这种困惑主要来自于 1949 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1957 年的变化和违心之论，我想多数人是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的，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对 1949 年后的突然转变，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 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对新执政者的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中，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我想通过 1949 年 11 月 1 日复刊后的《观察》及储安平个人的选择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观察》的复刊

《观察》是 1946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刊的。它的前身是 1945 年在重庆创办的《客观》周刊。《观察》1948 年 12 月 24 日被国民党查封，实际存

在了不足 3 年时间。《观察》此前的办刊宗旨、风格、言论特色都完全体现了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它言论的大胆、文风的犀利、关心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前途的赤诚之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一直认为《观察》周刊的诞生和短暂存在，是西方新闻思想在古老中国的成功实践。

《观察》1948 年底被迫停刊，到 1949 年 11 月 1 日复刊，其间仅有 10 个月的时间，但这 10 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 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两党都有清醒的评价，但历史的发展却使这些清醒的言论和具体的行为之间出现巨大反差。1946 年至 1948 年间，在《观察》上曾围绕“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参预论战的还有当时的《大公报》（上海）《中建》《世纪评论》等杂志，杨人楩、张东荪、施复亮、李孝友、朱光潜、邹文海、杜迈之等都写了文章。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重读他们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时，很为他们的理智和清醒所震惊，他们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从总体看，对国民党的评价要高于共产党，我这里的评价侧重于在文化精神上，而不包括他们管理国家的行政方式和最终结果。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的言论是为人熟知的，杨人楩曾在《观察》上写过一篇《国民党往何处去？》的文章，后储又请杨写一篇《中共往何处去？》，杨最终未作，但却给储写了一封《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长信。信是 1947 年 9 月 28 日写的，请留意这个时间。杨在信中说：“保留‘争论’并非终止‘争论’，因为自由主义者始终是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的”[1]。不必多引，类似的言论，在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更绝对的。张东荪曾说过：“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无异于要我在枪毙与死刑之间作一选择”[2]。当年浙大外文系主任余昆珊则有言：“共产党来了，我就自杀”[3]。许多事实使我们实在难以相信 1949 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在这里我想请人们注意“青年信仰”这个问题。“青年信仰”是指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青年信仰”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我们对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产生敬重，实际源于他们的“青年信仰”，他们在晚年能保持清醒的判断能力，也与他们的“青年信仰”分不开，如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等，近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即是明显例证。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 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 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 49 年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49 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一些敬重，

而 1949 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也即余英时所谓的“边缘化”了，但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

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需要我们长期反省的。
[1]《观察》第 3 卷第 10 期第 11 页。

[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 212 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3]冯世则《“不言论”的自由》,《读书》1993 年第 8 期第 146 页。

《观察》的突然转向今天已成为窥测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我个人怀疑这种突然转变的真诚性，但大量当时出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又在否定我的想法：他们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我想起了多年前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觉。

这位 1966 年自杀的著名翻译家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 1957 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4]，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5]。我们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 1957 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话，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6]。“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的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7]。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傅雷的困惑在那里呢？我以为在于他的轻信。

傅雷也好，储安平也好，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理性、平等、宽容、信任等为基本行为准则的。这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风度，使他们把讲话和行事视为同一。

1949 年后，在新的环境下所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方面的，中国社会这种典型的文本与实际脱节，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谁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但绝不准有同人报纸刊物；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写着，但绝不准自由结社。文本上存在许多，但在统计上都是零。

1957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清楚了这一点，其代价是 55 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命运。 [4]傅敏编《傅雷家书》第 108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 12 月第 3 版。

[5]傅敏编《傅雷家书》第 122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 12 月第 3 版。

[6]傅敏编《傅雷家书》第 134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 12 月第 3 版。

[7]傅敏编《傅雷家书》第 158 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0 年 12 月第 3 版。

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 1949 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初看起来，这两点在当时都具备了，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在理智上意识到你的对手是什么，可在行为上又迁就呢？

《周恩来年谱》在 1949 年 7 月 12 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8]。我想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复刊了”[9]。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可见与储的关系。《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 1949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950 年 5 月止。《新观察》的第一任主编是黎澍，第二任主编是来自四野新华社总分社的杨赓。《新观察》刚筹备时，储安平还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后，储安平完全不来了。冯英子说储安平的性格是“自视更高，他从来不作第二人想”[10]。 [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 883 页，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

[9]林元《碎布集》第 40 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

[10]冯英子《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第 41 页，见《编辑记者 100 人》，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

《观察》在 49 年以前曾发行到 10 万 5 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 1 万 2 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 10 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储安平最终离开他壮年时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一个毕生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的不适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复刊后的《观察》

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这可以从他当年创办《观察》时给胡适的几封信中看出[11]。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它究竟要干什么事情，谁也预料不到。在他们面前就如同一衰朽的老人和初生的婴儿，老人的一切都是直接的具体的，好坏分明，而新生的婴儿却是难以预测的，谁也说不清它将来会是什么。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168、225、239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11 月版。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 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

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 1949 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 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 1957 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 40 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 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 1949 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可见当初的思想改造是多么荒唐。1957 年夏天，对所谓的思想改造是莫大的嘲讽,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形成的信仰,那里会在强权下真正被改造？只不过表示沉默和迁就而已。美学家朱光潜在《观察》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也写了一篇《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光潜对自由主义是很推崇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到:“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术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12]。正是这位朱光潜，在 1949 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 1951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3]。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人了，但在 1980 年以后，朱光潜首次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14]，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15]。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

[12]《观察》1948 年 3 卷 19 期第 8 页。

[13]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山西《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 年第 1 期第 163 页。

[14]《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 370 页，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15]《朱光潜全集》第 2 卷第 210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储安平 49 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 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理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在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

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曾记否？1957 年，有多少知识分子无法忍受控制言论的文化专制主义，多次提出同人报纸，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的呼声，然而他们无一逃过“右派”的命运。对言论自由的渴望，最终被无情地消磨殆尽了。1957 年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再公开争取办同人出版社的权利。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 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Obse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 14 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露面了。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 4 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 11 期发表了《美帝在亚州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观察》的转向，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

三、《观察》的终止

为了给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思路，我从复刊后的《观察》中选择几篇文章来作一简单的分析。

复刊后的《观察》在第 3 期上新辟“读者观察”专栏，专发读者对刊物的意见和编者的一些回答。我从中选择了署名吴四维和沈叔平的两封读者来信。

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

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赞颂毛泽东个人，承认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行，甚至对党对军队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评价，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好像自己过去犯了什么罪一样。请看如下一段：

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

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

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

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

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

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

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

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

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

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

决地反对看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

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象自

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16] [16]《观察》第 6 卷第 1 期第 4 页。

多么谦卑的自我批评。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作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今天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他们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某种狭隘的复仇心理，也懂得秀才遇见兵的道理。《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

对复刊后的《观察》，我们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

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17]
[17]《观察》第 6 卷第 3 期第 28 页。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18]。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18]《观察》第 6 卷第 3 期第 28 页。

后记

这本集子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丁东和贺雄飞两位先生，是他们的热情，使我能有机会把这本差不多 5 年前写的书再拿出来。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这本集子中一部分内容是我过去出版过的书中已有的（主要是一些随感），这是我特别要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因这样做有背于我过去的习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在 1994 年完成的《〈观察〉研究》一书仅有十几万字，这在目前条件下单独出书是有一点困难的，而我一直想让这本书能有机会与读者见面，为此我同意了贺雄飞先生的意见，收入了另外一些文章，就成了现在这样一本书。我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已不是很满意，但基本观点没有改变。对于贺雄飞先生在出版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我始终心存感激。

谢　泳

1998 年 11 月 25 日于太原